

一九二〇年代台灣國族意識的形成： 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

曾士榮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當前學界對於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相關研究已經累積到相當的程度，但是以下的關鍵問題似乎仍需要適當的回應：一九一〇年代的台灣社會與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社會看來是如此的不同，從前者到後者的歷史變遷在台灣社會的脈絡中究竟是如何呈現的？換言之，一九二〇年代風起雲湧的近代式台灣政治文化運動是如何在台灣社會的具體脈絡中浮現並開展？通過陳旺成這位台灣政治文化運動參與者的個人視角，而非多數學者所採用的運動史的取徑，筆者檢視他跨越一九一〇年代與一九二〇年代的私人日記紀錄，試圖對此一課題作出回應。

本文從「日記／認同」的研究取徑切入，以一九二〇年代台灣的國族意識的形成為主題，援用約計四十八冊且尚待出版的《陳旺成日記》為主要研究史料，試圖探討台灣的國族意識在什麼樣的具體的歷史脈絡下、如何地形成的課題。

筆者指出，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前半期間（1920~1925），陳旺成的整個精神世界以及思想世界經歷一次根本性的重構，而他的台灣國族意識（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則是伴隨著此一根本性的重構，而在一九二〇年代中後期間逐漸形成。筆者進一步指出，此一精神世界以及思想世界的重構源自於兩

個相互糾結的面向影響所致：一方面是透過他的經驗性的政治社會網絡建構而成，一方面則是他抽象地透過印刷資本主義的宣傳與閱讀的意識型態建構而成。

關鍵字：日記、國族意識、朋友圈、精神世界、思想世界

**The Formation of a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1920s Taiwan:
An Examination of *Chen Wangcheng's*
*Diary (1912-1930)***

Tzeng Shih-ju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presents an attempt to use numerous volumes of mostly unpublished diaries, viewed as private forms of ego documents, as the main source for examining identity-centered issues. Using the private diary of a Taiwanese intellectual, Chen Wangcheng, I have examined how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merged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in the 1920s. The examined case suggests that Chen's mental and ideological world experienced a radical reconstruction, between 1920 and 1925, which was followed by an emergence of his sense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late 1920s. Chen's sense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as created via an empirical construction, on the

one hand, through the working of the politico-social networks, and via an abstract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spread of print-capitalism on the other.

Key words: diary,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ircle of friend, mental world,
ideological world

一九二〇年代台灣國族意識的形成：

以《陳旺成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12~1930）

前言

學界關於台灣國族意識的起源的研究，目前已經存在幾種不同的解釋觀點，這些學者們傾向認為，台灣國族意識源自於日治時期的台灣。黃昭堂指出，台灣（國族）意識出現於台灣人反抗日本外來殖民統治與差別待遇的過程之中，在此期間，一個全島性近代交通體系的完成促使散居全島不同地區的島民得以將台灣人民想像成為一個國族的共同體¹。透過對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政治運動（1914~1937）的通盤檢視，陳以德（Edward Chen）指出，在這些因反抗外來統治的激化的政治運動支持者之中，存在著「一股強烈的國族意識」。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核心思想——自治理念——的理論建構者林呈祿（1886~1928），宣稱台灣「在文化上」具有與日本文化區別的特殊性的同時，也不贊成台灣回歸中國，此一宣稱使林呈祿成為第一位對台灣國族主義作出明確的表達的台灣人。陳以德進一步指出，台灣政治運動的出現以及其背後的近代式理念應放在一個較

** 本文第二部引用陳旺成的閱讀資料，因避免全文篇幅過長的考量，關於其出處來源僅在敘述中作簡要的說明；至於其詳細的出處來源請參考筆者牛津大學博士論文中的「Appendix」（本文改寫自該論文的第一章，論文題目：From Hōnto Jin to Bensheng Ren -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現由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進行英文專書出版中。）

¹ 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市：自由時代發行，1989年），頁39-41。

廣的歷史脈絡中加以檢視。這個歷史脈絡指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威爾遜宣示的民族自決原則廣受當時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朝鮮、台灣與中國)的人民的歡迎，而當時的日本也處於各方面相對自由的大正民主時期²。周婉窈則進一步討論：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什麼樣的具體脈絡下，這些近代式理念透過何種方式影響像林呈祿這類留學日本的海外台灣留學生？以自治理念為基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它又如何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的台灣開始展開？周婉窈採用 George Kerr 關於殖民時期台灣的「世代區分」概念，進一步指出：一個年輕且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台灣人世代大約出現於一九一〇年代後期，這個世代的台灣人精英對於像議設運動這類的台灣政治運動產生扮演了關鍵性角色³。

從制度面著手論證台灣國族主義出現於一九二〇年代的學者有吳叡人，他透過對 Anderson-Chatterjee 的理論的修正，試圖審視為什麼是「台灣國族主義」，而不是「中國國族主義」出現於一九二〇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通過將日本帝國解釋成一個「擴張中的國族國家」，他指出，日本在台灣、朝鮮與樺太的殖民主義是「透過差序性的制度將這些周邊疆界進行整合的一種國族化的殖民主義，在此一國族化的殖民主義中，其周邊的疆界被置於一種制度的 limilarity 的狀態，同時也被賦予一種雙重的邊陲性。」此一制度的 limilarity 狀態「在台灣人民的心中，將台灣作為一種殖民地的空間轉變成一種國族的空間，並且在一九一〇年代與一九二〇年代期間，台灣人民開始從對抗日本政府的過程中發展出一種政治上的國族主義的論述。」再者，在一九二〇年代與一九三〇年代間，台灣人民在對抗日本同化主義的過程中也明確傳達出一種文化上的國族主義。在政治上與文化上，「此一雙重的邊陲性格迫使台灣人民採取支持西方的與近代式的思想策略，以進行他們的國族想像⁴。」同樣受到 Anderson 的想像共同體的理論啟發，並且肯定台灣國族主義出現於一九二〇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的學者若林正丈，他指出，在台灣歷史上有兩種「社會統合」(或稱「巡禮圈」)

² Chen, Edward: "Formosan Political Movement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914-1937".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3, 1972, pp. 481-483, p. 495.

³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市：自立晚報，1989年)，頁9-18，27-56，70-96。

⁴ George Kerr: *Formosa: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1974. Wu Rwei-ren: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2003, pp. x, xi, 384-392.

產生，包括以北京為中心的中華帝國的「士大夫巡禮圈」，以及以台北為中心並形成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規模巡禮圈」。在清帝國時期，一個士大夫階級形成於台灣，而此一士大夫階級在某種程度上被整合到清帝國的社會統合之中。然而，形成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規模巡禮圈」與受到西方殖民統治的東南亞國族主義比較類似。此一台灣規模的社會統合，是在以行政、交通與教育體系為基礎而建構出的全島性近代市場體系之中形成的。再者，在日本殖民時期，接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知識人具體化了此一台灣規模的社會統合；然而，這些台灣知識人因受到種族歧視而無法進入日本帝國的核心，為了要對抗此一差別待遇，他們發起了一系列全島性抗日的政治文化運動，這類的政治文化運動因此成為此一台灣規模的社會統合的本質。再者，這些台灣知識人同時也是台灣的印刷資本主義創構者，透過此一印刷資本主義的運用，那些屬於台灣規模的社會統合的人們，因此可以將他們自身想像成一種稱為「台灣人」的共同體⁵。

在本篇文章中，筆者擬處理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首先，在近代台灣歷史上的台灣國族意識是如何出現？其後，此一台灣國族意識又以何種方式演變？因此，筆者以冊數多達四十八冊的《陳旺成日記》為中心，以陳旺成這位受過完整日本教育的第一個世代的台灣知識人為個案，討論這位未曾留學日本的台灣知識人的台灣國族意識是如何出現在一九二〇年代台灣島內的歷史情境中？之後又經過什麼樣的演變？

筆者首先分析陳旺成在此一期間的朋友圈的樣態，藉以釐清他的朋友圈所體現的社會關係網絡是如何影響他的國族意識、乃至影響他的整個思想與精神世界建構與重構。在此，筆者所謂的「朋友圈」分析，是指針對各種不同人群之間相互之間的對話與接觸的數量與本質所體現的社會關係而進行的分析。因此，針對陳旺成的朋友圈的討論，有助於我們採取一個「經驗的／政社的」取徑來理解陳旺成的國族意識的建構。其次，筆者分析陳旺成在此期間的閱讀資料，藉以釐清他所閱讀的出版品的情況，並進而分析這些出版品如何影響他的國族意識，乃至影響他的整個思想與精神世界的建構與重構。對任何一位讀者而言，「閱讀資料」只有在讀者與印刷文字之間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抽象交流與互

⁵ 若林正丈，《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市：月旦，1994年），頁51-55。

動的時候，它們才會產生意義。因此，對於陳旺成的閱讀資料的討論，有助於我們採取一個「抽象的／意識的」取徑來理解陳旺成的國族意識的建構。進入本文正式討論前，筆者先簡介陳旺成的生平。

陳旺成的生平概述

從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陳旺成（1888～1979）是一個活躍於台灣社會的台灣人政治文化精英。他在新竹郊區的赤土崎出生，屬於陳氏家族移居台灣的第三個世代，在一八六〇年代，他的祖父陳降從福建省的泉州府移居台灣。陳旺成出生時登記為黃旺成，係承自外祖父之姓，這是因為父親陳送於二十五歲時入贅於黃家所致。陳送後來移入新竹城內居住，遷移戶籍時，因喜歡他的兒子與他同姓，於是登記為陳旺成。因此，在當時的戶籍欄上有「陳旺成即黃旺成」等說明文字⁶。陳旺成從公學校畢業之前，他的父母在新竹城內經營一家商店，販賣陶器及布類⁷。

陳旺成在一九一二年開始任職於新竹公學校教師以前，不僅接受長達八年的漢文私塾教育（1895～1902），而且也接受公學校及國語學校的完整日文教育（1903～1911）。在孩童時代，黃旺成先是從一八九五年開始受業於赤土崎張鵬飛所開設的漢文私塾；後來，從一八九八年起，改在新竹城內周國珍所開設的私塾學習漢文。當時新竹的私塾約有一、二十所之多，但規模並不大，每所的學生約有十餘人，也有少數女生加入。至於當時私塾所講授的內容則以三字經、四書、五經等漢文書籍為主⁸。雖然日本從一八九五年已經開始在台灣進行殖民統治，但是陳旺成直到十五歲（1903）才進入由殖民政府所辦的新竹公學校就讀⁹。

陳旺成所接受的日本學校教育包括兩個主要部份：也就是新竹公學校的基礎教育（1903～1907），以及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的專業教育（1907～

⁶ 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收入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北縣板橋市：林本源基金會，1991年），頁73-74。又參見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出版，竹塹文化發行，1999年），頁28-30。

⁷ 同上註。

⁸ 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紀錄〉，頁76-79。

⁹ 同上註，頁79。

1911)。陳旺成進入公學校就讀時期，全校約有七、八個班級；但當時的台灣社會對日本的學校教育反應冷淡，學生大都經過勸誘才入學就讀，所以剛入學時學生並不多，而且中途退學的學生不少；此外，公學校的教員大都是日本人，當時只有二位教漢文科目的本島人教師（其中包括影響陳旺成甚深的張麟書，1856~1933）；學校內的重要科目是日語與算術，其次是修身與漢文，每週有漢文課約四到五小時；至於歷史、地理與理科則尚未在學校中正式設課，而是附帶在日語課中教授¹⁰。到了一九〇七年，陳旺成進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師範部就讀，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與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齊名，兩個學校都是當時台灣的公學校畢業生得以尋求進一步學習僅有的選擇。國語學校包括國語部與師範部，前者僅一組，以養成低級公務員為目的，專收本島人學生；後者共有甲、乙組，以養成小學校或公學校的教員為目的，甲組只收本島人，乙組則只收內地人。國語學校學生修業年限為四年，學生全部公費，且不分種族一律住在學校宿舍，共同生活。國語學校的本島人學生每年約有一百名，當時在學校內的大部份學生仍然穿著漢裝，並留有辮子，所受待遇也比內地人學生差一些，且與內地人學生之間常有衝突。國語學校的本島人教員只有二名，其餘皆為內地人。陳旺成當年同時考入國語學校與醫學校，當時錄取率大約是在三、四人之中錄取一名；由於當時的台灣社會較不重視醫生，於是他選擇就讀國語學校¹¹。陳旺成在國語學校勤學日語，可以說很好的日語，在與同學赴日本畢業旅行期間的一次參觀訪問中，他受邀代表其他同學在日本聽眾之前作了一次日語的演說¹²。

雖然陳旺成從培養專業師資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但他的教師生涯並不算長，只持續八年之久（1911~1918）。一九一一年，陳旺成與林玉盞（1889~，富商之女但纏足且未受教育）結婚，時齡二十三歲的他也在同一年開始在母校（新竹公學校）教書，他的職稱是訓導，係文官職，月薪大約是十五日圓。除教書以外，陳旺成在一九一三年與幾位本島人教員共同組織一個

¹⁰ 公學校只供本島人學生就讀，而小學校則供日內地人學生就讀。日本統治早期對公學校學童的入學年齡並無限制。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收入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頁 80。

¹¹ 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頁 80。

¹² 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頁 120。

名為「亂彈會」的詩社，這個以撰寫與欣賞漢詩的詩社，定期舉行聚會，且該會持續運作到陳旺成離開新竹公學校以後（1918年）。陳旺成於一九一八年辭去教職之後，設法經營一家商店，但並未成功。一九一九年三月，因嚮往中國大陸的自然景色，首次赴中國福建的福州旅遊，歷時長達一個月。

一九二〇年，陳旺成開始在台中的蔡蓮舫家族中擔任日文家庭教師和財務經理人，為期五年（1920～1925）。蔡蓮舫（1875～1936）家族是台中清水的大地主，蔡蓮舫本人擔任過台中廳參事與台中區長等職。自日本佔領台灣以來，一直與殖民政府保持合作的關係¹³。而蔡蓮舫的姪子蔡惠如（1881～1929）是台灣政治文化運動初期的領導人物之一，他在一九一五年變賣家產並移居大陸的福州，被視為是親中國的台灣人。一九二〇年，由於蔡蓮舫、林獻堂（1881～1956）與林烈堂（1876～1947）合資的「振南會社」香港分社的業務需要，陳旺成第二度赴中國大陸，並遊歷廣州、廈門及汕頭等地¹⁴。

陳旺成直到一九二〇年代中期才開始直接參與台灣人的政治文化啟蒙運動，當時這些活動已經在台灣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一九二五年五月陳旺成辭去台中的工作後，與朋友在新竹組織「新竹青年會」，目的是改善新竹地區的文化環境。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加入台灣文化協會¹⁵。稍後，他在《台灣民報》擔任記者與編輯等職，撰寫政治短評，偶爾也透過改寫大陸出版的報紙及文章，將中國的時事介紹給台灣民眾，因此當時被視為中國事務的專家¹⁶。一九二七年一月，由於台灣文化協會內部的左傾分子成功地取得主導權，導致該會分裂為二。同年七月，蔣渭水（1891～1931）所領導的非左傾分子在台中創立台灣民眾黨，創黨的五名主要成員中包括陳旺成與陳逢源（1893～1982）¹⁷。根據陳逢源的回憶，在一九二〇年代後期，蔣渭水與陳旺成兩人在政治上溫和的台灣民眾黨內部中是核心人物¹⁸。然而，由於黨內的左傾成員數目快速增加，台

¹³ 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頁 40-41。

¹⁴ 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頁 75-86；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頁 43-44。

¹⁵ 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頁 86-88。

¹⁶ 同註 13，頁 55-58。

¹⁷ 同註 15，頁 90。日本殖民當局提出警告，如果蔣渭水加入台灣民眾黨，則該黨將會遭到解散。

¹⁸ 王世慶，〈陳逢源先生訪問記錄〉，收入黃富三、陳俐甫編，〈近現代台灣口述歷史〉，（台

灣民眾黨逐漸轉變成一個左傾的政治團體。一九三一年二月，黨內的左傾成員堅持複製日本共產黨的黨綱，以對該黨黨綱進行修訂。此一提議雖然遭到陳旺成投票反對，卻在黨的執行委員會中獲得通過。因此，日本殖民政府在十天之後決定將台灣民眾黨予以解散¹⁹。

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台灣政治文化運動內部流派因意識型態上的衝突與殖民政府鎮壓，以及日本帝國內部逐漸興起的軍國主義等因素，陳旺成被迫退出這個運動，於一九三二年八月辭去《台灣新民報》的職務，稍後分別在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四年赴南京及上海等地遊歷，期待在中國尋求長期的工作前景，但無法如願而回到台灣²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他參與台灣史上首次地方選舉，以最高票獲選為新竹市的民選市議員。在擔任新竹市議員期間（1935~1939），與朋友在桃園合資一家針織公司，販售米穀雜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他被控唆使新竹青年加入中國的抗日戰爭，而受拘禁於新竹警局長達三百天之久²¹。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戰敗投降之後，陳旺成與幾位地方精英分子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新竹分團，以維護地方秩序。在同年十月，他與幾位文化界朋友在台北創立中文的報紙《民報》擔任該報主筆一職。《民報》傳承自日本時代《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的台灣人辦報傳統。在戰後初期，該報對陳儀政府的失政作出尖銳的批評，而受到本地民眾的支持，發行量僅次於半官方的《台灣新生報》²²。一九四六年四月，陳旺成在台北選區參加省參議會選舉，結果列入候補名單的第二名。次年，二二八事件發生，陳旺成因曾在《民報》批評

北縣板橋市：林本源基金會，1991年），頁147。

¹⁹ 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頁91。

²⁰ 同上註。

²¹ 根據陳旺成在1967年的回憶所述，他在1942年春天遭到拘禁達300天之久。然而，1941年9月27日，他在日記中記載：「晚，芳攜清（酒）兩合多與小肴來，以紀念去年今日受檢察調查。」此一記錄顯示陳旺成於1940年9月間受到調查。再者，他於1941年10月1日記載：「午邊，有州之江口特務來訪，憶去年第一次帶予往檢查者，問及治警事件之就行猶豫者近況，囑予善為指導。」此一記錄顯示陳旺成可能在1940年間受到調查。以上兩份證據顯示陳旺成在1967年的回憶並不正確，他在1940年9月底應已遭到拘禁，且有可能更早。另有一個證據似可支持筆者的推論，亦即，筆者無法找到介於1939年12月下旬與1941年9月30日之間的日記記錄。陳旺成有可能在這段期間因遭到拘禁及其衍生的相關原因而無法寫日記。參見註6，頁92-93。

²² 同註19，頁94。

陳儀政府的失政而被列為該事件的三十名要犯之一，為此他逃到南京與上海等地，躲藏近一年之久；至於《民報》則遭到關閉²³。在一九四八年間，他回到台灣向國民政府自首，並在國民政府撤銷對他的指控以後，擔任台灣省通誌館的編纂。一九四九年間，因省參議員王添燈死於二二八事件，加上另一名省參議員蔣渭川被延攬進入省政府，陳旺成得以遞補進入省參議會擔任省參議員。兩年以後，他受聘為新竹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編纂《新竹縣誌》²⁴；在一九五七年完成縣誌編纂後開始退休生涯。

一、陳旺成的朋友圈：陳氏的台灣國族意識的建構 ——一個「經驗性的／政社關係的」取徑

本文的第一部份，筆者討論陳旺成的朋友圈，亦即以朋友或夥伴之間各種的接觸關係為基礎的關係網絡，藉以釐清陳氏置身於什麼樣的政治與社會關係網絡之中；再者，這個政社關係網絡對於陳旺成的台灣國族意識的形成與變遷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一）「本島人 vs. 內地人」：一九一〇年代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民意識

從一個較為廣義的教育脈絡來看，在一九一〇年代初期，也就是當陳旺成開始任教於新竹公學校的時候，殖民地台灣的新竹地區的學校生活樣態為何？首先，除了各式各樣的教學活動以外，甫自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的陳旺成，在新竹公學校任職期間經常暴露在各種象徵日本帝國的國家儀式、活動與思維之中。若以他在一九一三與一九一四這二年所寫的日記紀錄為例，在一九一三年四月二日，經過二年的教學服務之後，他獲得殖民教育當局的允許，得以穿上象徵日本文官身份且頗為昂貴的文官制服；而在同一天，他決定剪去象徵滿清帝國認同的辮子，剪辮之後，他的母親則為他準備牲禮，並燒金拜拜，藉以表示對剪辮一事的鄭重。一個星期以後（4月8日），他第一次穿上這套文

²³ 黃繼文，陳鳳華整理，〈父親黃旺成的追憶〉，收入《竹塹文獻》雜誌，第10期，（新竹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頁50-52。

²⁴ 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頁95-96。

官服，頭頂戴著鑲著金紋的文官帽，腰際則配著刀。此後，每當他參加像新春節慶或始政紀念日等官式典禮的時候，他都會穿上這套文官服²⁵。在這類的國家典禮或儀式中，學校的所有成員通常會被要求唱日本國歌、向日本天皇與皇后的御照敬禮，並且聆聽公學校的日本校長誦讀帝國的教育飭語等等²⁶。透過這類儀式的運作，一種對日本帝國的忠誠意識被期待得以灌輸於台灣人學童與老師之中。再者，一九一〇年代初期新竹地區的公學校生活有時候也包括一些與軍事相關的活動，例如對於政府軍隊平定地方動亂的慶祝活動，特別是針對當時仍偶爾發動滋擾事件的新竹山區原住民勢力的平定。這類的學校活動很明顯是為了讓台灣學童深刻瞭解到日本這個強大的殖民政府正逐漸深化對本地社會的控制²⁷。

相對於日本官方在學校內部執行其塑造忠誠殖民地子民的計劃，在學校或其他公職部門之外，陳旺成仍然明顯地暴露在台灣本土漢人社會的宗教文化氛圍之下。這些本地的宗教傳統包括家庭內部的祖先祭祀，以及與寺廟相關的各式各樣活動；在一九一〇年代初期的新竹地區，這些台灣漢人宗教活動仍非常的活躍。至於清代漢人社會的各種舊慣習俗，例如使用陰曆、傳統漢人的服飾及禮儀、男子辮髮及女子纏足等習俗，在當時的新竹地區仍然處處可見。

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之下，陳旺成採取一種相當務實且富有彈性的方式來面對這些舊社會的文化與習俗。一九一五年五月三十日，他在自己家中舉辦一次詩會，其間他作了一首題目為「纏足」的漢詩，藉由此詩表達他反對纏足舊習的意思，因為他認為纏足令人「難以行走」。一週以後，也就是他的妻子解除纏足那一日，他在學校內向他的學生講述結辮子與剪辮子的歷史。再過二日，他替他的家中的五位男性親人剪去辮子，並於剪辮之後燒香拜拜，以示慎重。就在這幾位親人剪辮以後的第三日，新竹公學校的大門口上演一齣戲，這齣戲是為了吸引當地居民加入當日在該公學校內所舉辦的剪辮大會而設的²⁸。但是似

²⁵ 《陳旺成日記》，1913/04/02，1913/04/08，1913/10/28，1913/10/31；再者，一年以後的10月8日（1914），陳旺成的日記顯示，當日「全校的學生」剪去了辮子。

²⁶ 台灣教育會編，《台灣教育沿革誌》，（台北市：南天，1939年），頁302-303。

²⁷ 《陳旺成日記》，1912/2/29，1912/3/16；又參見1913/1/11，1913/9/5。

²⁸ 《陳旺成日記》，1915/5/30，1915/6/7，1915/6/9，1915/6/12。

乎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這段期間新竹居民剪辮與解足人數的明顯增加是受到一九一二年發生在中國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影響所致；這個發展可以說主要是受到殖民政府地方當局的鼓勵與推動而造成的。然而，陳旺成作為一個接受日式教育養成的學校教師，在剪除象徵清代漢人認同的辮子上，他比起新竹的一般居民直到一九一五年左右才開始進行大規模剪辮活動，在時間上仍早了兩年。事實上，這些象徵清代漢人認同的舊習俗（例如結辮與纏足），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殖民政府引進台灣且揉合「日本式」與「近代式」的新規範所取代；而在取代的過程中，新竹地區的居民涉入一個「變成日本殖民地子民」的過程。

儘管如此，陳旺成的學校生活經驗，特別是在學校內部與內地人同事之間的關係，有時候卻是緊張的。陳旺成在這所專供本島人學童就讀的新竹公學校內長達八年的服務期間（1911～1918），他的朋友圈主要是以新竹地區的本島人公學校教師為中心。以陳旺成開始任教那一年（1911）為例，新竹公學校有十四位教職員，其中包括高木平太郎校長，五名內地人教諭（含 1 名囑咐），五名本島人訓導，以及三名本島人雇員。該校共有十一個班級，合計五百八十五名本島人學生²⁹。當時的教師在台灣社會中頗受尊敬，部份原因是學校教師同時也具有文官身份³⁰。雖然本島人教師與內地人教師的待遇都不錯，但內地人教師得以從殖民政府取得大約百分之五十薪俸的額外加給。儘管陳旺成所受待遇不錯，在一九一二年的一整年間，卻經常抱怨內地人校長高木平太郎在態度上的傲慢與粗魯，也因此兩度想要辭去教師的職務。例如，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雖然當天是週日，高木校長卻要求全校教員及學生必須到校，而當大家到校以後，經過冗長的等待卻不見該校長出現，此事令陳旺成極度不滿。同年，該校有另外兩位本島人教師以辭職作為威脅，抗議該校長的粗暴態度。可知當時新竹公學校內本島人教師與學校當局之間存在相當的緊張關係³¹。

²⁹ 陳旺成編，《台灣省新竹縣誌稿》，卷 7，（新竹市：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4 年），頁 4。
又參見《台灣總督府職員錄》，（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11 年），頁 258-259。

³⁰ 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頁 30。

³¹ 《陳旺成日記》，1912/1/13，1912/2/29，1912/4/1，1912/6/18，1912/8/17，1912/9/11-12，

然而，這種緊張關係的根源是什麼呢？在一九一二年三月，新竹公學校全部教員達成一個協議：學校教員在辦公室內只能說日語。二年九個月以後，也就是一九一四年十二月，這些教員們又達成另一個較為嚴格的協議：學校教員及高年級學生若在校內違反「只說日語」的規定，將會受到罰鍰的處罰。經過一個月以後，關於這項「只說日語」的規定究竟在校內所應適用的範圍及程度為何的問題，卻在陳旺成與另一位內地人教員之間爆發爭議³²。這個事件隨後升高為本島人教員與內地人教員之間的衝突；同時這個令陳旺成經常困擾的「只說日語」的規定，很可能就是他從一九一五年二、三月間決定開始改用文言體漢文書寫日記的主因。陳旺成在當年的二月五日（亦即該事件發生後一個月）開始較常使用漢文書寫日記，並在往後的幾個星期間同時使用日文及漢文書寫日記；直到一九一五年三月下旬起，他固定改用漢文書寫日記³³。並且此環繞在本島人與內地人教師之間語言議題上的爭議，具體反映出：即使到了一九一〇年代中期，在台灣的公職部門內部仍存在明顯的族群緊張關係。也大約在這個期間（1915），台灣南部爆發反殖民的西來庵事件，這個由任職於地方保甲單位的精英所發動的大規模武裝抗日事件，造成超過一千人死亡；雖然此一事件後來證明是武官總督統治期（1895~1919）最後一次由台灣漢人發起的武裝抗日事件，但它也說明了當時在新竹之外的台灣半公職部門中，本島人精英仍有可能以武力方式發動大規模反殖民政府的行動³⁴。

導致本島人教師之間自成一圈以詩會為中心的朋友圈的原因，一部份是來自族群文化上同屬漢族的連繫性，而他們在學校內部共同面對的工作歧視，更強化此朋友圈的內在凝聚力³⁵。始自一九一二年，陳旺成參與同校本島人教師首次舉辦的詩會；一九一三年秋天開始，此詩社進一步發展成名為「亂彈會」的固定集會組織。此一以寫作與吟誦古典漢詩為主的詩社，是由該校資深漢文教師張麟書所主導；曾在清朝取得舉人功名的鄭家珍（1868~1928）則經常獲邀，對該詩社提

1912/9/18-19, 1912/9/22, 1912/12/2。

³² 《陳旺成日記》，1912/3/19, 1914/12/8, 1915/1/7。

³³ 《陳旺成日記》，1915/2/5, 1915/3-17-31。直到1925年，他的漢文（文言文）書寫習慣才為白話文所取代；自此以後，他持續使用白話文書寫日記，直到1973年他不再寫日記為止。

³⁴ Katz, Paul: "Local Elites and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Ta-pa-ni Incident of 1915", *Paper Presented at Defang Jingying Yu Taiwan Nongmin Yundong Guoji Xueshu Yantaohui*, 2005, pp.1-5.

³⁵ 《陳旺成日記》，1912/4/6, 1912/7/1, 1912/10/14。

供各種意見³⁶。直到一九一七年，新竹地區另一所公學校數名本島人教師也加入「亂彈會」，使該會成員達到十二名。陳旺成對於漢詩極為狂熱，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間，他在日記中抄錄的古典漢詩，有二百三十首之多。此外，他有時候也撰寫古典漢詩，並在一九一五年間曾經嘗試用古典漢詩的形式撰寫數日的日記³⁷。

一九一七年初冬之際，一系列環繞在內地人校長與本島人教師之間族群關係議題的事件，最後導致陳旺成的辭職。這一連串事件始自該校上原宗五郎校長於同年十一月間用粗暴的言語批評本島人學生。三個星期以後，當這位校長講授修身課時，對著本島人學生說道：「本校（本島人）訓導傲慢，於事務室中高談，發揮清國奴本性。」對此，陳旺成在日記中作出回應，認為該校長無禮且不值得尊敬³⁸。一星期後，陳旺成再次在日記中記載該校長對學校教職員的「暴言」數項，其中包括他對內地人教諭的稱讚以及對本島人訓導的責備，甚至對本島人訓導說出「雖多多辭職亦無妨」的言語。由於陳旺成認為這些言論非常「可惡」，隔日他刻意遲到學校以抗議該校長的倨傲態度，並在另一位資深本島人教師的聲援下，挺身大聲斥責該校長，以作為對該校長的「第一步示威運動」。當日下午課後，所有本島人教職員集合開會，決議由其中三位教職員提出辭呈以表示嚴正抗議。在往後的數日間，雙方之間的緊張關係持續升高，陳旺成等三人決定向新竹州教育係長阿部正平（曾任職新竹公學校）交涉辭職一事，但阿部正平「以官勢欲鎮壓，余竟以最硬之言當（擋）之。」如此的緊張關係後來因上原校長為他的失言作出誠摯的道歉而暫告結束³⁹。儘管如此，這三位本島人訓導仍於一九一八年初即該學年結束後正式辭去教職。事實上，在辭職事件發生的前幾年，新竹公學校另外三名本島人教員已先行辭去教職，並往實業界等領域尋求發展。陳旺成辭職的決定，意謂著他無意留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公共部門中擔任公職；換言之，對陳旺成而言，脫離殖民政府的「公」領域正意謂著他進一步往台灣本土社會與本土認同的回歸過程⁴⁰。

³⁶ 《陳旺成日記》，1912/3/26。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頁36-38。

³⁷ 同上註，1999，頁38-39。《陳旺成日記》，1915/3/27，1915/3/30，1915/7/19-20。這230首漢詩也包含少數陳旺成自己的創作。

³⁸ 《陳旺成日記》，1917/11/10，1917/12/5。

³⁹ 《陳旺成日記》，1917/12/12-19。

⁴⁰ 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頁39-40。

然而在什麼樣的心理與社會的基礎上，導致陳旺成與另兩位本島人教師在一九一八年初以如此堅定的態度辭去教職呢？首先，筆者想問的是，直到一九一〇年代後期，新竹地區的學校生活比起一九一〇年代初期產生了什麼樣的改變呢？以一九一七年的日記為例，從這一年間學校內外情境來觀察，陳旺成的確涉入更為密集、以展現日本帝國意識型態為目的而舉辦的活動之中。這些活動包括新竹公學校成員歡迎日本皇室北白川宮成久抵達新竹的訪問；為了準備此迎活動，該校成員在當年十月間共花十天的時間進行相關禮儀的排演，而在北白川宮成久抵達新竹當日，新竹的民眾與學生約有二、三千人參加此迎接活動⁴¹。除此之外，新竹公學校成員也經常參加或涉入由官方舉辦的市民活動；例如公共演講、展覽會與各式各樣的日語學習課程及講習會等⁴²。然而相對於這些以體現殖民政府深化其對新竹地方社會影響力為目的的各類活動，一個以新竹地區本島人教師所組成的固定詩會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也逐漸擴展中；由於此社會網絡是以傳統漢文化主義為核心的詩會作為基礎，因此也可被視為是一股體現新竹地方社會得以超越殖民政府控制力的本土影響力⁴³。相關的研究顯示，在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當局並未強力地鎮壓這類以本島人為中心的詩會活動⁴⁴。可以說，主要是由於這個以詩會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以及作為其根源的漢文化主義，提供了具有工具性與持續性作用的基礎；在此基礎上，陳旺成與另兩位本島人教師，得以透過辭去教職的方式，堅決地從殖民地公職部門的關係網絡之中脫離而出，回歸到台灣本土社會以本島人為中心的政治與社經網絡之中，繼續尋求他的職業生涯。

以上的討論顯示：一九一〇年代後期的台灣，殖民地公職部門內部本島人與內地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相當明顯，也顯示出此時期本島人與內地人已經成為具有明確界定與自我意識的兩個穩定的族群團體，而不只是殖民統治初期由官方賦予的抽象的族群分類名稱。

⁴¹ 《陳旺成日記》，1917/10/19-27。

⁴² 《陳旺成日記》，1917/2/2, 1917/4/12, 1917/5/4, 1917/5/12, 1917/7/9, 1917/8/10, 1917/10/4, 1917/12/8, 1917/12/21。

⁴³ 《陳旺成日記》，1917/5/13, 1917/7/10, 1917/9/19, 1917/9/29, 1917/10/16-17。

⁴⁴ 鍾美芳，《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頁45-46。
《陳旺成日記》，1917/9/9, 1917/9/21, 1917/9/28, 1917/10/23, 1917/10/27, 1917/12/24。

(二) 一個國族自我 (a national self) 的浮現：陳氏的社會關係網絡及其對近代思想的吸取 (1920 年 4 月～1925 年 3 月)

在開始討論陳旺成所處的社會關係網絡之前，首先需要描述台灣在一九一〇年代末期的一般歷史情境。就政治的情境而言，一九一九年原敬內閣開始在台灣實行文官統治以進行自由主義的政治實驗，該政策影響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開展。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對於在日本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產生深刻影響，這些留學生人數約有兩千名 (1920 年)。此外威爾遜所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對於朝鮮三一運動與中國五四運動的出現也具有明顯影響。而這些留日的台灣學生經過與朝鮮及中國留學生的接觸，加上在日本的實地見聞，也開始學習有關如何組織動員民眾的政治運動經驗⁴⁵。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二〇年一月，一群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創立新民會，其中的主要成員包括林呈祿 (1887～1967)、蔡培火 (1889～1983) 與蔡式毅 (1884～1951) 等人；同時也包括提供財力支援的台灣中部大地主林獻堂 (1881～1956) 及蔡惠如 (1881～1929)，當時兩人分別擔任新民會的會長與副會長。新民會的三個主要目標是開展出一個改革殖民統治為宗旨的政治運動，出版一份啟蒙台灣人政治文化意識為目標的雜誌，以及尋求中國對台灣的支持。這些目標的一部分在稍後獲得實現，在一九二〇年七月，一本名為《台灣青年》的中日文月刊開始出刊，當時的刊行量大約有三千份；但並沒有足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可以證明新民會在尋求中國的支持上有所成就⁴⁶。這些台灣的留日學生在一九二〇年的一整年間，對於如何透過政治運動以改革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問題，一直爭論著應該採用「同化主義」或是「自治主義」作為台灣政治運動的主要路線。大部份的新民會成員剛開始都傾向支持「同化主義」的路線，因為在一九一四年由板垣退助所組成的「台灣同化會」就已經開始提倡同化主義的路線，而這個同化取徑也在此後幾年成為由台灣人精英推動的「六三法撤廢聯盟」(1918～1920) 所依據的主要理念；因此這個聯盟的主要目標是

⁴⁵ Chen, Edward I-te: *Formosan Political Movement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914-1937*, p.481.

⁴⁶ 同上註，p.481-482.

廢除造成本島人遭受差別統治的「六三法」的法律依據⁴⁷。然而，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新民會召開一次會員大會之後，台灣留學生環繞在「同化主義」與「自治主義」之間的路線爭辯終於停止，而由林呈祿所主導的自治派在該會中贏得多數的支持。法學出身的林呈祿是建構自治主義路線的理論創始人物，他的台灣自治理論直接受到日本自由派學者吉野作造（1878~1933）、山本美越乃與泉哲等人的影響而來。在這一次的大會中，林呈祿的自治主義路線經過略加修改後，成為後來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且這個自治主義路線的確立，也在往後的數年間（特別是一九二〇年代前期）開展出一系列以台灣自治理念為思想核心的台灣政治、文化運動⁴⁸。

從一九二〇年四月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即陳旺成在台中蔡蓮舫家工作期間，他的本島人意識經歷一次根本性的重構。廣義而言，導致這個意識重構的原因與上面提及的台灣政治、文化運動展開初期所產生的影響關係密切。而且陳旺成在台中的五年期間也正好與大正民主時期部份重疊。更明確地說，造成此意識重構的主要原因有二個：首先是受到他在台中地區的朋友圈（以蔡家的社會關係網絡為中心）的影響；其次是他在一九二〇年代前期受到由日本與中國等地進口的書籍或其它出版品的啟發所導致。

1、陳氏的台灣國族意識的浮現與其以林獻堂／蔡蓮舫家族為中心的台中社會網絡（1920~1923）

陳旺成赴台中工作期間，他的社會關係網絡明顯從新竹地區以教師為中心的朋友圈，擴展到台中地區以蔡家的社會關係為中心的朋友圈。陳旺成的台灣國族意識的初步浮現，一部分是由於這些社會關係產生的作用所導致。

陳旺成於一九一八年辭去教職後，他嘗試經商但未能成功，後來赴中國旅遊一個月。一九二〇年四月，蔡蓮舫聘請他擔任財務經理人，以處理蔡家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全球性經濟蕭條所造成的股市投資損失。由於一九二〇年的

⁴⁷ Lamley, Harry: "Assimilation Efforts in Colonial Taiwan: The Fate of the 1914 Movement." *Monumenta Serica*, 29, 1970-1971, pp.496-498. Chen, Edward I-te: 1972, pp.481-482.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市：自立晚報，1989年），頁28-34。

⁴⁸ Chen, Edward I-te: "Formosan Political Movement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914-1937", pp.482-483;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34-35, 36-50。

陳旺成日記已經遺失，他當時如何受聘到蔡家的細節已經無法得知。除了擔任財務經理人之外，陳旺成也擔任蔡家子弟的私人家庭教師，有時並替蔡蓮舫做日文的通譯⁴⁹。

蔡蓮舫是台中地區的士紳，自從日本接收台灣以來就一直與殖民政府合作，並曾經領受殖民政府頒發的紳章，擔任大肚上堡的保良局長，也受邀參加過明治天皇葬式，並於一九一五年任台中區長，當時他的資產大約三十萬日圓⁵⁰。然而蔡蓮舫的姪子蔡惠如是台灣政治文化運動初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當時蔡惠如被視為中國的同情者。透過蔡家的社會與商業關係，陳旺成得以接觸台中地區來自非官方與官方各形各色的朋友。此外，陳旺成與中部地區幾個重要的大家族皆維持聯繫，包括霧峰林家、清水楊家與鹿港辜家等。這些大家族的主要成員，包括林獻堂、蔡惠如與楊肇嘉（1892~1976）等人，都是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而林獻堂的堂兄林烈堂（1876~1947）也是台灣政治運動的間接支持者。另一方面，林獻堂、林烈堂與其他幾位士紳和蔡蓮舫是商業上的合夥人，他們共同投資振南株式會社。因此陳旺成在處理蔡家的財務之餘，得以直接或間接與林獻堂及林烈堂等人接觸。透過這些社會上與工作上的關係，使陳旺成與這些台灣政治文化運動要角保持一定的聯繫⁵¹。

然而在什麼樣的歷史情境下，陳旺成逐漸受到一次大戰後引入台灣的近代思想影響呢？並且他的本島人意識是因何種原因、以何種方式轉化重構成為「近代國族意識」？我們又能否追溯此種國族意識的起源與轉化重構的變遷軌跡？

事實上從陳旺成開始赴台中工作以後，逐漸暴露在一個容易接觸到一群具有改革心靈的台灣知識精英所倡行的「新思想」環境之中⁵²。陳旺成於一九二〇年四月開始在台中工作時，正好是東京台灣留學生創立新民會之後的幾個月，這群由台中地區出身的林獻堂與蔡惠如所領導的東京台灣留學生在當時正爭辯

⁴⁹ 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頁 40-41。

⁵⁰ 台灣日日新報社編，《台灣列紳傳》（台北市：台灣總督府，1916 年），頁 187。

⁵¹ 張德南，〈黃旺成——從教師到記者的轉折〉，《竹塹文獻雜誌》第 10 冊（新竹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9 年），頁 60-61。

⁵² 洪世昌，《台灣民報與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化運動，1920-1932》（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頁 51。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初，大約有半數的該會幹部來自中部台灣。

著「同化」與「自治」的路線問題，並於一九二〇年七月開始在東京正式出版《台灣青年》月刊。這正是當時陳旺成所處的歷史情境。由於陳旺成一九二〇年的日記遺失，筆者無法得知當年他對這些東京台灣留學生活動所作出的具體反映。然而檢視陳旺成一九二一年的日記仍可瞭解他在思想上的新傾向。一九二一年一月六日，也就是東京的新民會成員決議採自治主義作為其政治運動主軸後的一個月，陳旺成在該日的日記中詳細摘要一篇刊於《台灣青年》討論六三法歷史的文章。由此可以推論他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以前，可能就已開始注意到這份由改革派台灣留日學生所刊行的雜誌。然而當日他摘要該篇文章以後，也增補了一段評論，他寫道：「留學生等大為運動廢除，聞獻堂因此問題已上京矣。」這段日記記錄顯示：他注意到東京新民會的活動，但仍不知道該會已放棄推動立基於同化主義理念的六三法的撤廢運動，並已改採自治主義以作為該會推動往後政治運動的原則⁵³。從一九二一年的日記所見，陳旺成記錄在這一年間他至少讀過《台灣青年》月刊達六次之多，顯示當年他已經是這份雜誌的固定讀者⁵⁴。然而除了閱讀改革性的出版品以外，對於將他導入一個更可能加速他思想世界重構的新思想環境而言，陳旺成以蔡家為基礎的社會關係網絡，應該也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究竟陳旺成在台中期間是暴露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呢？他的社會接觸關係又以何種方式影響他對近代新思想的吸收？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口述訪談中，陳旺成透露出他經過蔡蓮舫家族而得以認識林獻堂，開啟了他於一九二〇年代後期參加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先機⁵⁵。如前所述，林獻堂及林烈堂等台中士紳與蔡蓮舫是商業上的合夥人，他們共同投資振南株式會社。而陳旺成在處理蔡家財務之餘，在工作等方面得以與這些士紳家族有所接觸。但是陳旺成與這些士紳家族（特別是霧峰林家）的接觸關係的本質究竟為何？林獻堂與東京台灣留學生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開始進行第一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這份請願書在東京獲得大多數台灣留學生的簽名。而在四天後，陳旺成在日記

⁵³ 《陳旺成日記》，1921/1/6。記者，〈六三問題之沿革〉，收入《台灣青年》第1卷第5號（東京：台灣青年雜誌社），1920年。

⁵⁴ 《陳旺成日記》，1921/1/6，1921/2/3，1921/7/17，1921/9/4-5，1921/11/2，1921/12/5。

⁵⁵ 王世慶，〈黃旺成先生訪問記錄〉，頁86。

中記載一位日本人特務中村來到蔡蓮舫家，「來還東京獻堂寄來之台灣議會建設請願書，並借觀《台灣青年》什誌。」再過大約二週後，陳旺成陪同蔡蓮舫與林烈堂前去訪問台中州立川知事，「談歐米困乏事、日支親善事……」，其後再與松本署長「談台灣議會事」⁵⁶。這兩項有關霧峰林家的紀錄，不僅顯示出當時陳旺成已經留意到台灣議會的活動，而且透露他與霧峰林家乃至日本地方官員之間的接觸關係。除此以外陳旺成與林獻堂本人也有直接的接觸。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下旬，林獻堂訪問蔡蓮舫家，並與蔡蓮舫談及殖民地政治及朝鮮獨立等議題。兩個月以後，林獻堂再度到蔡家訪問，並與陳旺成等人「談世界事、日支親善事，頗投契，一同在寓中餐。」一九二三年一月，陳旺成等人應林烈堂之邀前往霧峰訪問，途中與林獻堂坐在同一個火車車廂內，在車廂中二人「促膝共談中國時事。」同年七月，陳旺成再次前往霧峰訪問，「訪林獻堂，偕堂亦在，受招待午餐，小談文化協會……，來訪澄堂，有客浙江人吳姓在談支那時事⁵⁷。」以上紀錄可以證明陳旺成與林獻堂之間直接的社會接觸。此外陳旺成與林烈堂之間的私人關係比起林獻堂更為密切。霧峰林家的林烈堂是蔡蓮舫的妹夫，同時也是林獻堂的堂兄弟，曾經資助過台灣政治運動。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林烈堂訪問蔡宅並邀請陳旺成一同聊天，其間林烈堂批評當時日本帝國外交政策的失敗。一週以後，林烈堂帶著在中國出版的《上海新報》再度來到蔡宅，並請陳旺成為他朗讀該報有關日英同盟的新聞⁵⁸。明顯地，林烈堂喜愛與陳旺成談論中國、台灣與日本有關的時事。再加上林烈堂本身對中國熟悉，在當地有生意上的投資，也曾經前往中國旅遊，並讓他的孩子在中國當地接受教育；以上這些紀錄顯示，林烈堂對於中國事務顯得相當地關注。除了中國事務以外，台灣政治運動也是林烈堂關注的另一個焦點，這可證之於一九二二年七月間，林烈堂反對一位企圖阻擋林獻堂所領導、策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的日本知事。直到一九二二年中期，陳旺成已經成為該台灣政治運動的支持者，同時也與林烈堂一樣支持台灣議會設置的請願運動⁵⁹。在一九二三年二月，

⁵⁶ 《陳旺成日記》，1921/2//3，1921/2/19。

⁵⁷ 《陳旺成日記》，1921/5/31，1921/7/24，1923/1/30，1923/7/17。

⁵⁸ 《陳旺成日記》，1921/5/29，1921/6/5-6。

⁵⁹ 《陳旺成日記》，1922/7/11，1922/7/23。

林烈堂向陳旺成展示一首為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寫的歌曲，陳旺成看過該歌曲之後的反應是極力強調「台灣人之覺醒」的必要性。可以說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的此刻，陳旺成所自覺的「台灣人」認同已經與一九一〇年代的「本島人」認同具有內涵上的實質差別，這種「台灣人」認同是於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全新的政治社會脈絡中初步顯露，更精確地說，這種「台灣人」認同是在台灣人自覺發展出的政治文化運動中經過認同重構後逐漸浮現。並且陳旺成的「台灣人」認同意識的萌生與轉化，相當程度受到他與霧峰林家之間的接觸關係的直接影響⁶⁰。

除了霧峰林家以外，陳旺成在蔡家內部所經歷的私人與工作經驗，也導致他對近代的新思想產生興趣。台中清水的蔡家成員中，蔡惠如深受陳旺成的尊敬，他是蔡蓮舫的姪子，也是新民會副會長與《台灣青年》的主要資助者，且是當時最受台灣留日學生歡迎的領導人物；他在台灣與中國兩地經商，是一位對中國懷抱同情的台灣士紳。除此之外，雖然蔡蓮舫本身長期與日本殖民政府合作，他對林獻堂所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則是堅定支持⁶¹。而且透過蔡家的社會網絡，陳旺成不僅得以與台中地區官方與非官方的朋友圈保持接觸，也得以將他的接觸網絡伸展到台灣全島；也因此陳旺成可與新民會的劉明朝及王敏川（1887~1942）等人「暢談台灣議會事」與「日本之新思想及中國地方之發達」，也有機會認識他心目中「一投手、一舉足皆文豪之體態」的連雅堂。連雅堂（1878~1936）是個傳統台灣文人，他於當時（1920~1921年間）出版為數三冊的《台灣通史》⁶²。簡言之，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三年間，陳旺成與台中朋友圈之間的互動與交流經驗，相當程度地影響且提高他對以台灣人意識為主軸的台灣政治文化運動、日本殖民地政治，以及中國事務與國際政治等方面的興趣。

此外陳旺成經常利用假日期間回到故鄉新竹，持續與新竹地區以教師／詩社為主的朋友圈保持連繫。與台中一樣，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的新竹也處於變動

⁶⁰ 《陳旺成日記》，1923/2/26，1923/3/7，1923/7/19。

⁶¹ 葉榮鐘，李南衡編，《台灣人物群相》（台北縣中和市：帕米爾，1985年），頁81-83；《陳旺成日記》，1922/7/11，1923/10/24。

⁶² 《陳旺成日記》，1921/1/9，1921/1/14，1921/1/30，1922/2/12，1922/7/22，1922/8/19。

中的台灣的思想大環境之中。這個新竹的朋友圈先是以教師／詩社為中心，現在則進一步發展成一個稱為「新竹青年自覺會」的非官方團體。這個團體的命名明顯受到東京新民會的附屬團體「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影響。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新竹青年自覺會」在莊嚴的氣氛下成立於新竹的一所公學校內，該團體由陳旺成的昔日同事張式毅主導，並由另一位公學校教師戴良負責行政事務⁶³。除此之外，另一個名為「竹聲會」的青年團體也大約在同一年（1921）創立，它的成員與「新竹青年自覺會」部份重疊。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間，新竹青年自覺會與竹聲會這兩個團體都不太活躍，同時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也不明確。就陳旺成的日記所見，竹聲會只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新竹公學校內舉辦過一次關於衛生的照片展覽活動。當時陳旺成似乎未直接參與這兩個團體，但在一九二三年春天，他在台中的一份報紙上發表一篇題為「敬告竹聲會諸君子書」的文章，談論他對竹聲會的使命以及實行方法的觀點，並獲得他這些新竹朋友的贊同。這也間接顯示，此一時期的陳旺成，因在台中接觸到林獻堂等台灣政治文化啟蒙運動的領導人物，而將自己視為在思想上較之其他新竹朋友更為「進步」的知識人，因此以思想的指導者的姿態面對這些新竹的朋友⁶⁴。

2、精神世界的轉化（1920～1923）

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間，特別是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聯盟開始每年赴東京進行請願。並且一九二一年十月設立於台北大稻埕的台灣文化協會也開始運作之後，陳旺成在此期間的精神世界的圖像是什麼？如何描述與重建此一圖像？

筆者在前面的討論認為，陳旺成在台中的朋友圈所體現的社會關係，使他得以接觸到台灣島內外的新思想與新聞時事等，逐漸地導致他整個精神世界的轉化與重構。這段期間陳旺成在精神世界上的轉化可由以下幾個面向加以呈現：首先，在認知的層次上，陳旺成逐漸發展出一個理解自身與外在世界的「新的」方式；而在政治意識上，他的精神世界的轉化則反映在他更清楚地自覺到

⁶³ 《陳旺成日記》，1921/2/25，1921/2/27，1921/3/7，1921/6/28。

⁶⁴ 《陳旺成日記》，1921/7/27，1921/8/20，1923/3/25，1923/4/4。陳旺成所稱的此一發表在台中報刊的文章，筆者並未找到。

他只是一個受日本殖民統治者「差別待遇」的台灣人。陳旺成在此期間對自我的認知的方式清楚地反映在以下幾段日記文字之中：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九日，他寫道：「午飯後往內地婦人理髮屋剪髮，甚不親切，自笑本島人理髮屋甚多，何故自尋無趣？晚，一中國人老丐（六八）來，憐而恤之兩角。」此紀錄中，陳旺成稱呼自己為本島人，「本島人」一詞是日本殖民時期最普遍用以稱呼台灣人民的用詞；但是，他偶爾稱自己為台灣人，而不用本島人一詞，這可參證前面引述他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與林烈堂談及台灣議會設置時極力強調「台灣人之覺醒」的文字。就在該次與林烈堂談話的一週前，另一個事件也顯示陳旺成的台灣人意識逐漸升高，以下是他對這個發生在新竹的事件的描述：「在東門外，見有內地人以刀刺本島人，流血滿面，而本島人聚集數十人，喧喧擾擾，更有勸被刺者莫與之較，群眾附和雷同，無有一人可用，予與大張旁觀，為之髮指⁶⁵。」對於此事件的反應，陳旺成顯露出他與其他圍觀群眾的一個明顯差異：亦即他對這件內地人刺傷本島人的事件極為不滿，「為之髮指」，並且對圍觀群眾認命軟弱的態度無法認同，甚至感到不齒。陳旺成逐漸將這種作為被統治者遭受壓迫的不公平處境的深刻政治自覺，轉化成為為改善此差別待遇為訴求的台灣政治運動推動者的支持。此種心理與意識上的轉化，可以在他於上述事件發生的數個月前寫給他新竹好友蔡式毅的一封信中獲得佐證：在這封寫給當時為東京新民會的活躍分子蔡式毅的信中，陳旺成透露出他對「自由與平等」價值的信仰，對「差別待遇與壓迫」的強烈反抗，以及對日本殖民政府承諾改善本島人的不平等地位的不信任心態⁶⁶。基於這些理念與對官方的不信任感，陳旺成進一步表示他對林獻堂的強力支持，這是因為他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旬親眼目擊林獻堂在一次會議中，遭到當時台中市長川中子暗諷他所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而起身駁斥該市長的內台平等的言論。換言之，直到一九二三年年初左右，在絕大多數台灣民眾可能仍對內台之間的問題缺乏政治自覺的時候，陳旺成已經明顯自覺到他自身作為受到差別待遇的台灣人的不平等地位，並認為該藉著強力支持台灣人所主導的政治文化運動以尋求改善此一

⁶⁵ 《陳旺成日記》，1921/11/9，1923/2/19，1923/2/26。

⁶⁶ 《陳旺成日記》，1922/7/23，1922/9/23，1922/9/26。

不平等的政治地位。而且在此期間，陳旺成的台灣意識與其對差別待遇的自覺意識，主要都是立基於由島外移入的近代式西方思想理念，像是「自由與平等」、「自治」等理念，而非直接源自於一九二〇年以前台灣傳統的漢人社會價值觀⁶⁷。

其次，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中期，陳旺成逐漸自覺到自己正置身在一個快速變動的思想環境之中，並「深感現今新舊思想衝突之激烈，未知何時方能一致。」在此期間，陳旺成與他的朋友之間在談論自身的思想轉變，以及台灣島內外的思想趨勢等議題上經常顯露出極大的興趣。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他記道：「與順臣、傳、榜等談思想推移及台灣思想之現狀，傾吐胸懷，殊覺痛快⁶⁸。」陳旺成除了逐漸深化其近代意義下的台灣意識的自覺之外，其他對他產生影響的思想主要是由當時推動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由國外引進台灣的關於近代性與自由主義的理念。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中旬，陳旺成生平首次參加作文比賽，寫作的題目是「同姓是否可以通婚？」當時陳旺成對這個題目極感興趣，並經常和他的朋友爭辯這個論題。在傳統的漢人社會中，同姓之間的婚姻是嚴格禁止的。但是，這次的作文比賽及該比賽在陳旺成的朋友圈內部引起的熱烈迴響，顯示當時這個在台灣激起新舊思想之間、傳統性與近代性之間衝突緊張的劇烈變動中的思想環境，已經迫近這位年輕且對新思想充滿好奇心的台灣知識人，並且使他無法置身其外⁶⁹。此外關於近代衛生、教育、乃至其他的政治方面的理念及實踐，陳旺成抱持相當開放的態度。這可印證於他主張應學習內地人「每日必浴」的習慣，因為他認為洗澡「夏可卻暑，冬可避寒，衛生上最好之習慣也。」不僅如此，他也支持台灣人的高等教育與義務教育，以及政治上的自由主義⁷⁰。一般而論，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年期間，從日記中所見的陳旺成是一個逐漸轉化成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近代式心智的、對殖民地差別待遇具有深刻自覺的台灣青年。

第三，陳旺成對於中國事務的興趣也在這段期間逐漸浮現。如前所述，陳旺成在台中的朋友圈中主要關注範疇之一是與中國有關的事務。深受陳旺成尊敬的蔡惠如是位赴中國經商投資的台灣人士紳，而與陳旺成熟稔的林烈堂則喜

⁶⁷ 《陳旺成日記》，1922/12/17，1922/12/19，1923/1/3，1923/1/6，1923/1/13，1923/2/26，1923/3/1。

⁶⁸ 《陳旺成日記》，1923/2/18，1923/3/25，1923/7/19。

⁶⁹ 《陳旺成日記》，1921/11/13，1921/11/25，1921/12/1-2。

⁷⁰ 《陳旺成日記》，1921/9/4，1922/1/18，1922/1/27，1922/2/7，1922/9/26，1923/3/14。

好與他談論中國事務，這兩人應該對他在中國事務方面的興趣上產生啟發的作用。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一次與蔡蓮舫家中成員的聊天中，陳旺成表達他想去東京留學的渴望，但也瞭解到他無法負擔所需的開銷；但同時他也留意到當時台灣社會的一個新趨勢，亦也就是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到中國留學。然在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認識到當時中國的許多地區正陷入政治混亂之中。在一九二二年間，他多次表達他對中國政治混亂的深度憂慮，並捐贈金錢以表示對因遭受天災而導致極大損失的中國部分地區同情⁷¹。

3、日本殖民政府的對策與治警事件

正當台灣政治文化運動推動者在全島擴張他們的影響力，逐漸撼動長期受到控制的台灣社會、並透過越來越多演講的舉辦與出版品的印製以宣揚新思想的同時，他們與日本殖民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也明顯浮現。殖民政府對來自台灣本土社會的挑戰的反制方式，可從以下三方面加以說明：拉攏，脅迫，以及警力鎮壓。「拉攏」是透過提供各級地方議會的職位給從事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台灣人精英，期待藉此換取他們對殖民政府的支持及忠誠；「脅迫」則包括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由殖民政府下令各級公職部門機構與日本人經營的私人公司的主管，必須解除那些直接涉入或是同情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台灣人雇員的職務⁷²。事實上，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台中地區的日本人地方首長企圖說服包括蔡蓮舫的當地土紳，以對林獻堂所領導議會設置運動加以抵制，但未能如願。然而因為殖民政府威脅要讓林獻堂失去一部份資產，後來他被迫短暫退出議會設置運動，導致他在該運動的領導地位也因此受到質疑。事實上，這些領導運動的台灣人精英以及主要的支持者經常受到日本特務的訪視與監控。蔡蓮舫家（及陳旺成）也固定受到這些日本特務的訪視，他們通常會採用一種較為公開的方式，訪問並蒐集這些台灣人精英對於重大的時事或事件的想法⁷³。

除此之外，一九二三年間為了贏取台灣社會的支持，並間接弱化反殖民的台灣政治文化運動，日本殖民政府採取兩項作法：首先，一九二三年四月

⁷¹ 《陳旺成日記》，1921/8/11，1922/1/7，1922/2/9，1922/7/29，1922/8/9。

⁷² 同註 2，pp.487-488。

⁷³ 《陳旺成日記》，1921/2/3，1921/9/29，1921/11/3，1921/11/25，1923/1/13，1923/1/15，1923/2/6。

間，日本皇太子正式訪問台灣，訪台期間包括蔡蓮舫等台中士紳受邀參加一個正式的典禮，並在台中親自迎接日本皇太子的到訪。當日「拜觀人眾，如山如海」，顯示當時台灣民眾對日本皇室成員抱有極大的歡迎熱忱。雖然蔡蓮舫獲賜機會可獨自覲見皇太子而感到相當的榮耀。但從同年稍後他對由辜顯榮主導親官方的公益會的冷漠態度觀之，他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實際態度仍可說是模稜兩可⁷⁴。在一九二三年間，殖民政府創立這個全島性支持殖民政府的公益會，這個由辜顯榮主導的公益會係由支持政府的台灣士紳所組成，其目的在於對抗由林獻堂等人所領導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與台灣文化協會等反殖民政府的台灣人團體⁷⁵。根據陳旺成日記，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年間，這個公益會費了數個月的時間設法拉攏蔡蓮舫，使其成為該會台中分會的負責人，但最後並未成功。就在同一期間，台灣文化協會已經開始在台中地區舉辦數次的公開演講，並逐漸喚起當地民眾的注意及支持。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底，蔡蓮舫與陳旺成一同前往林獻堂家族的祠堂，第一次參加這類由台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文化演講會。陳旺成在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的日記中描述他生平首次參與這類的文化演講：「警察十分戒嚴，對於言談，又十分取締，旁聽內地人有欲攪擾者，其狀甚卑劣，最後蔡培火君所講『愛之本質』，最惹人傾聽。」隔日七月三十一日，陳旺成與蔡蓮舫談及這場演講，對於前一日蔡培火的言論「互相嘆賞」；又於當日晚上與他十歲的長子繼圖一同到同一地點聽第二場的演講會，當日「八時已滿員，不得入矣，……吳靈江之『婦女問題』最有趣味⁷⁶。」也許是因為蔡蓮舫相當欣賞文協所舉辦的文化演講，加上他與林獻堂等人長期的友誼，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初，他經過與陳旺成數次商量以後，決定不加入支持殖民政府的公益會。然而，公益會卻在報紙刊載蔡蓮舫願意接受公益會台中支部長一職的新聞，企圖強迫他加入公益會；為此，蔡蓮舫請陳旺成代他向該報提出更正。此外，同年八月十日，包括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十五位朋友受邀參加蔡蓮舫家舉辦的一個私人宴會，在會中，公益會及辜顯榮成為

⁷⁴ 《陳旺成日記》，1923/4/14-20，1923/4/27-29。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黃旺成》，頁41。

⁷⁵ 《陳旺成日記》，1923/7/2。

⁷⁶ 《陳旺成日記》，1923/7/30，1923/7/31，1923/8/1。

眾人批評的對象，這也透露出當時蔡蓮舫仍傾向支持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這個陣營⁷⁷。

簡言之，在一九二三年下半，台中地區的政治氛圍，可以大致描述如下：當時支持台灣人主導的政治文化運動陣營，與支持日本殖民政府陣營二者之間的緊張及衝突正不斷地升高，這可印證於當時陳旺成的一個觀察：「現時地方青年有與警官衝突為榮譽者（舉梧棲之例），不可不戒。」顯示情緒較為激進的台中青年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反感程度，甚至已經足以令陳旺成等支持台灣政治文化運動者感到不安⁷⁸。為了反制這一波快速上揚的台灣人反殖民政府情緒，殖民政府於一九二三年年底發動一波全島性的政治鎮壓行動，但對陳旺成而言，此一稱為「治警事件」的官方鎮壓行動反而使他更為同情這些遭到逮捕的台灣政治文化運動者，並進而深化他作為台灣人的台灣國族意識。一九二三年二月，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導精英在東京的《台灣》雜誌社（也就是《台灣青年》的前身）創立一個名為「台灣議會請願期成同盟」的政治性團體，同年稍後，東京當地發生極具破壞性的大地震；而在台灣，則因改革派台灣青年的演講與出版品的增加，滋長出一股持續上升中反政府情感，同時警察鎮壓的氛圍相應而來。在此一島內外的情境之下，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終於爆發由殖民政府主導的全島性搜查、傳喚與逮捕近百名台灣改革派政治運動菁英，這些遭到逮捕者包括陳旺成就讀國語學校的兩名同學，他在新竹的一名朋友，以及三名台中蔡家與霧峰林家的家族成員⁷⁹。從治警事件爆發之初，陳旺成就已經密切注意著這個全島性事件的發展，他觀察到台灣社會對該事件的最初反應還算平靜，「唯（台中）清水最激憤」；可以推測，由於陳旺成當時在台中清水的蔡家工作，加上部份遭受逮捕的台灣菁英與他的關係密切，他應受到此一事件相當深刻的影響。事實上，陳旺成對這些遭受逮捕的台灣菁英相當支持，並將他們視為一群有理想性與正義感的「壯士」⁸⁰。這個治警事件後來吸引全日本民眾的注意力，並獲得來自日本的著名律師的支持與同情，挺身而出為這群遭受逮

⁷⁷ 《陳旺成日記》，1923/8/4-7，1923/8/10。

⁷⁸ 《陳旺成日記》，1923/8/22，1923/8/19。

⁷⁹ 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 81-83。

⁸⁰ 《陳旺成日記》，1923/12/16-17，1923/12/19，1923/12/21，1923/12/26-28，1924/2/27，1924/3/7。

捕的台灣菁英辯護。在日本內地與台灣的輿論強大關注之下，法院先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間宣判這些被告者無罪，但高等法院於當年十月間推翻原先的無罪判決，最後一部份的被告者被判決入監服役，刑期為數個月不等⁸¹。

4、陳氏的台灣國族意識及其浮現中的中國意識（1924年～1925年3月）

一九二四年七月初，由蔣渭水所主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全島性「無力者大會」，不僅展現出台灣政治文化運動陣營正面對抗殖民政府主導的治警事件的鎮壓行動，以及對抗支持殖民政府的公益會所發起的「有力者大會」的決心。同時它也在台灣政治文化運動內部導入當時正在島外逐漸興起的社會主義的思潮。上述伴隨「無力者大會」而來的這兩種發展對陳旺成也造成明顯且重要的影響，這可從他基於台灣國族意識而日漸升高的反日本殖民政府情緒，以及稍後在他的思想世界中逐漸浮現的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發展得到證明。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無力者大會」分別同時在台北、台中與台南三個地點舉行。根據陳旺成的日記，他所參加的「無力者大會」是在台中霧峰林家的祠堂舉行，大約有一千名民眾參加，會中選林獻堂為議長，宣揚「無力者大會」主旨並批判月前由公益會所發起的「有力者大會」，繼而有林幼春與黃周等人的演說，陳旺成將二人關於「無力者」的定義之演講內容摘錄於當日日記之中：有力者是「以錢壓人、以勢壓人」或以武力壓人；無力者則反之，無力者係「士農工商守份安職」之人，而非無能力之人；「古者力即真理，今乃真理即力；民眾之聲即神之聲，神之聲即真理也。」顯然陳旺成對於這類「反威權」、「尊民意」的理念十分信服，並將無力者的聲音視為一種普遍性的「世界潮流」；加上該會有人提議前去慰問因治警事件列為被告的蔡惠如，因此，陳旺成與另一位蔡家成員蔡遜庭於隔日（7月4日）前往慰問蔡惠如。此外，在「無力者大會」召開之後的一個星期，陳旺成利用假期回到新竹，他當時仍相當熱衷地與新竹舊友談論該會會況，可見該會所傳達的「反殖民威權」、「尊民主潮流」思想對他造成相當明顯的影響⁸²。

⁸¹ Chen, Edward: "Formosan Political Movement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1914-1937", p. 488.

⁸² 《陳旺成日記》，1924/7/1-3，1924/7/10-11。葉榮鐘，李南衡編，《台灣人物群相》，頁85。

再者，陳旺成立基於台灣意識的反日本殖民情感，因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辭去台中工作之前參加一系列由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精英所推動的活動的激盪，而獲得進一步的強化。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陳旺成在台中參加一個約兩百人的歡迎會，這個歡迎會是為了迎接剛從日本東京完成第五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後返台的請願人士而舉辦的，其間蔡培火與蔣渭水發表演說，其內容搏得陳旺成的喝采，將其視為「上乘」的言論。次日，陳旺成又參加同一陣營的東京台灣青年會在台中舉辦的留日學生演講，共有六名講員上台，針對社會文化等議題作啟蒙式的演說，共吸引大約三千名台中地區的聽眾。陳旺成顯然對這類全島性的啟蒙演說活動抱持極大的興趣與熱忱。並於隔年（1925）的二月二十一日，在台中參加一次約有數百名群眾的遊行，該遊行活動是為了支持因治警事件而確定遭到判刑將入獄服刑三個月的蔡惠如而舉辦的。陳旺成在遊行中親眼目睹台灣群眾對這位台灣政治運動領導人物的強力支持與熱愛，感動之餘，在日記上作出一個結論：「正見台灣人心之不死也⁸³。」可以說，陳旺成並有意無意地持續讓自己暴露在以上所述的「全島性的」或「台灣規模的」政治事件與文化事件的深刻影響之中，像是全島性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對治警事件的反動活動、台灣文化協會以思想啟蒙為目標的全島性演講及報紙出版品的宣傳活動等等；由於這些事件與活動涉及台灣知識人從政治與文化面向進行以台灣為規模的「社會統合」，藉以使台灣民眾得以將他們自身想像成一種稱為「台灣人」的共同體；因此可說，陳旺成在這些全島性的政治事件與文化事件的雙重影響之下，漸漸將他的台灣意識推向一個具有「國族性」意義的發展過程。

不僅如此，陳旺成的社會主義傾向大約也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間開始浮現，此一思想的發展也反映出期間整個台灣政治文化運動新取徑的浮現。究其原因，陳旺成的社會主義傾向的浮現一部份源自於他在一九二四年七月所參加的「無力者大會」，因此，也可說是間接地源自於他的台中朋友圈的社會關係的作用；而另一部份則源自於他在該時期所閱讀的社會主義讀物的影響所致（參見本文第二部份）。一九二五年三月，陳旺成強力支持他的新竹舊友在新竹組織一個研究「社會思想」的社團，這顯示當時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關心及興趣。

⁸³ 《陳旺成日記》，1924/7/21-22，1924/7/25，1925/2/21。

然而早在一九二四年九月，在他的日記紀錄中已經可以窺見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浮現。一九二四年九月十日，陳旺成「因同情佃農」、「要為農民請命」，不得不低聲下氣地與他的地主老板蔡蓮舫以及蔡氏那位「反覆無常」且「橫暴」的四妾協調一位佃農的佃耕問題；當時，陳旺成傾向認為佃農的地位與處境是受到「壓迫」的。而且在一週以後，陳旺成與初自中國南京來蔡家任教中文的錢澤身談論思想問題時，錢氏從中國歷史經驗的角度極力論證共產主義與當時中國文化的不相容，但陳旺成卻因此將錢氏視為「守舊派」人士；此一紀錄也間接顯示陳旺成傾向將自己定位成一位「進步的」的社會主義者⁸⁴。

筆者想追問的是：大約在此一時期，陳旺成為什麼而又如何地變成一個社會主義思想的同情者與信仰者呢？此一思想的轉變明顯和他參加「無力者大會」以及隨後的相關書籍閱讀有直接且密切的關聯。在陳旺成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初參加「無力者大會」之後的二、三個星期期間，他所閱讀的作品仍然以島外移入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主，然而到了一九二四年八月間，他很不尋常地開始注意到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作品。從一開始，他就顯露出極大的熱忱閱讀賀川豐彥（1888~1960）的日文小說《死線を越えて》一書，連續三天（8/11~8/13）將該書的上卷讀完。並且每日在日記中記載當日所讀部份的故事情節重點摘要及讀後心得，其摘錄的內容包括「貧兒受富兒之虧及貧民窟之狀況」、「資本家不肯救援貧旅者」、「榮一與鶴子之戀愛」、「榮一入貧民窟受諸困苦」、「憐惜會社之職工之虐待」等重點⁸⁵。一週以後（8月下旬），陳旺成繼續花四天的時間閱讀《死線を越えて》的下卷「太陽を射る」，同樣每日摘錄該小說的故事情節，摘錄的內容包括「榮一因憐惜會社同盟罷業而受檢察審問」、「朝鮮人受暴漢之襲擊與榮一之同情」等重點⁸⁶。就在同一期間（8月下旬），陳旺成讀畢該小說之後，連續兩天在日記中以日文摘錄列寧和馬克斯的生平簡介，以及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階級身分的分類等觀念，但他所參考的日文資料的出處則無從得知。然而，審視以上這些摘錄的內容，大抵離不開社會主義的思想及關懷，同時也間接透

⁸⁴ 《陳旺成日記》，1924/9/9-10，1924/9/19。

⁸⁵ 《陳旺成日記》，1924/8/11-13。賀川豐彥，《死線を越えて》（東京：改造社，1921年）。本書的下卷的標題為《太陽を射る》。

⁸⁶ 《陳旺成日記》，1924/8/21-22，1924/7/26-27。

露出此一期間陳旺成本身的閱讀興趣、思想傾向與社會關懷的方向⁸⁷。簡言之，陳旺成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出現，與他參與「無力者大會」的經驗以及隨後的社會主義書籍閱讀具有密切的關聯；但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陳旺成寄身於台中大地主蔡蓮舫的家中，此一獨特的工作環境與人際接觸的經驗，也很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喚醒他自身的階級意識，也就是他作為一個出身自小農商家庭的中產階級自我的階級意識，階級身份的自覺可能使他因此較同情那些「無力者」。

再者，陳旺成在台中的朋友圈，特別是他與一九二四年八月底開始在蔡家擔任中文家庭教師的錢澤身（中國南京人）的朋友關係，明顯強化他從一九二零年代初期逐漸形成對中國事務的關心與興趣的傾向，此一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他的台灣國族認同架構下的中國國族意識面向的浮現。早從一九二一年起，由於在台中的朋友圈的影響，陳旺成已對中國事務產生特別的興趣。直到一九二四年中期，證據顯示他對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領導人胡適的思想感到興趣，並開始嘗試用現代白話文取代傳統文言文以進行日記的撰寫。從一九二四年八月底起，當南京來的錢澤深開始在蔡家擔任中文教師以後，陳旺成使用白話文進行寫作的新思維獲得進一步開展⁸⁸。在蔡家，這位南京來的中文教師受到相當的禮遇，這多少是因為蔡家內部的許多成員對中國事務感興趣，並將他視為可以取得中國相關知識的資訊管道之一。其中，陳旺成相當積極的想向錢氏學習聽、說北京話，以及白話文的書寫。就在錢氏來到蔡家的兩、三個星期之後，陳旺成開始嘗試用白話文寫日記以及練習聽講北京話；而自當年十一月起，他開始與錢氏透過每日固定的語言交換以學習白話中文⁸⁹。此外，陳旺成透過與錢氏經常性的討論，得以進一步瞭解中國文學、哲學、文化與政治等方面的書籍與資訊。錢澤深是一位中國國族主義者，他曾經兩度援引中國思想家梁啟超在南京演講時關於台灣的處境的談話，試圖「喚醒」陳旺成作為日本殖民統治下「受壓迫」的台灣人意識⁹⁰。簡言之，在一九二五

⁸⁷ 《陳旺成日記》，1924/8/27-28。

⁸⁸ 《陳旺成日記》，1924/5/15，1924/5/24，1924/8/29。

⁸⁹ 《陳旺成日記》，1924/8/30，1924/9/1-2，1924/9/9，1924/9/12-14，1924/9/18，1924/9/21，1924/9/26，1924/10/5，1924/11/10。

⁹⁰ 張德南，《堅勁耿介的社會運動家——黃旺成》，頁 44。《陳旺成日記》，1924/11/8，1924/12/6-7，1924/12/13，1925/2/19，1925/2/26。

年初，也就是陳旺成即將結束台中的工作而回到新竹之際，他的知識世界中已經發展出對中國事務方面的明顯興趣，且特別關注當時由胡適及陳獨秀等人提倡並在中國蔚為風潮的新文化運動。這一點也反映在他從一九二五年二月初便開始固定使用白話文寫日記，並且在這個期間，陳旺成有時會顯露出一種替中國辯護的態度；每當他的朋友在某些主題上發表對中國的批評言論時，他經常會為此提出反駁，並為中國辯護；大約也在這個期間，他生平中第一次透露出他未來想到中國華中地區經營事業的想法，也間接顯示出他台灣國族認同中的中國面向正逐漸浮現⁹¹。

陳旺成台中的朋友圈中，也包括一些日本人；雖然他的台灣意識以及反殖民情感明顯強化，但一般來說他仍相當歡迎那些支持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日本自由派人士。一九二五年一月九日，陳旺成與蔡惠如、蔡培火等人前去新竹火車站迎接日本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1869～1947），並於同日晚間到新竹公會堂聽田川氏的演講，講題為「台灣の自治を思ふ」，當晚「聽眾蟻集，有二千多人」；田川氏是英國式殖民地自治論的支持者，他反對日本在台灣所提倡的殖民地同化論。在此演講的五個月以前，陳旺成前往台中公會堂參加由林獻堂等人發起的渡邊暢歡迎會，吸引近三百人參加；渡邊暢是日本貴族院議員，也是一位支持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日本人律師，陳旺成則尊稱他為「人格者」。除此之外，陳旺成也參加過其他日本人士談論近代知識以及中國事務的演講會⁹²。由於陳旺成在蔡家擔任通譯及財務經理人，他經常有機會與台中地區的日本地方官員和銀行經理人接觸，為他的老板蔡蓮舫協商地方政治或是處理財經等事務⁹³。

（三）朝向一個「政治化的自我」：身陷「支持 vs. 對抗」殖民政府 二陣營之間糾葛關係（1925年3月～1925年12月）

在一九二五年三月，當陳旺成結束台中的工作回到新竹時，陳旺成的精神世界的圖像顯示：當時他是一位具有反殖民情感與台灣國族意識的青年；同時，

⁹¹ 《陳旺成日記》，1925/1/12，1925/2/1，1925/2/8-10。

⁹² 《陳旺成日記》，1924/8/8，1924/11/7，1924/12/29-30，1925/1/9。

⁹³ 《陳旺成日記》，1922/2/11，1925/3/1，1925/3/3。

在這個精神世界的主體之中，他的中國面向的認同意識逐漸浮現，並且他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在逐漸萌芽之中。雖然陳旺成在思想上明顯認同台灣政治文化運動陣營的理念，但直到一九二五年年底，他才正式加入這個陣營，並成為反殖民的台灣文化協會的幹部。在此之後，他在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陣營內部相當活躍，特別是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二年期間，他以地方層級的台灣人為中心的朋友圈，也在此一期間快速擴展成以台灣島為規模的台灣人朋友圈。因此，筆者的問題是：在一九二五年年初，陳旺成是個在「意識型態上」認同台灣國族主義以及其他近代理念的台灣人，但是基於什麼原因、什麼過程，他得以在一九二五年年底進而轉變成一個在「政治上」以實際行動支持並推動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要角呢？換句話說，在一九二五年這個關鍵的一年間，在支持與反抗殖民政府的二個陣營的複雜糾葛關係之間，陳旺成如何定位自身？

在陳旺成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初從台中回到新竹之後的幾個月，雖然在意識型態上他已經明顯認同台灣台灣政治文化運動，但在「政治上」他仍與台灣文化協會保持一定的距離，並未以實際行動直接加入這個反殖民的台灣人所主導的團體。或許是基於政治上的謹慎，他選擇加入較為溫和的「新竹青年會」（改組自前面提及的「竹聲會」）。由於他在台中工作的五年期間仍然與新竹的舊友保持密切聯繫，當他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回到新竹以後的第三天，他便很快地與先前以教師為中心的朋友圈重新連結，並取得其中部份朋友的支持，開始計劃組織一個「社會思想研究發表會」。基於上述兩個理由，陳旺成決定在新竹成立這個研究團體：首先，他不滿於既有的竹聲會受到官方控制且行動力不足；其次，他批評這些新竹地區的年輕知識人胸無大志，同時與當時處於劇烈變動中的台灣思想環境隔離。因此他堅決主張，在新竹進行文化的啟蒙及宣傳事業的時候。「必須支配現勢，不可被現勢支配」，相當鮮明地透露出他想改變新竹地區的思想環境的信念與意志⁹⁴。究竟他相信他可以根據什麼來「改變」這個思想環境呢？在那個時期他的思想世界的核心信仰與價值究竟又是什麼呢？就在陳旺成回到新竹後的第三個星期，在三月二十七日當天，當他閱讀由改革派台灣知識人所辦的《台灣民報》後，從他記載的日記內容或許可窺見他當時的

⁹⁴ 《陳旺成日記》，1925/2/1，1925/3/7，1925/3/10，1925/3/21，1925/3/25。

核心信仰與價值的大略圖像，他寫道：「把它看完，有兩句可以記的是：『正義不死，真理不滅。』這是現在的主義者的金科玉律，換句話說，就是生命可以犧牲的主義是斷斷不可變改的。吃過中飯，用平常的衣服，現了台灣人本來的面目。到圖書館看報紙，看了《經世新報》極力攻擊文化協會，說是帶著赤色煽動勞資爭議，我說這是向正義而行的，什麼赤不赤呢⁹⁵？」

以上這段日記文字透露當時陳旺成核心信仰與價值的基本輪廓：首先，他堅信，在當時殖民地台灣的歷史情境中，他自己是站在「正義與真理」的一方，同時這是無可改變的，甚至值得犧牲自己生命來換取。其次，他暗示他的台灣人認同才是他原初且最為真實的自我。第三，即使當時他在思想上已經初步顯露出社會主義的傾向，但為反駁官方《經世新報》的赤色指控，替這個反殖民的台灣文化協會辯護，他相信台灣文化協會與他同樣也是站在「正義與真理」的一方。換言之，直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底，陳旺成已經在思想上做好準備，並顯露出相當明顯的意志以追求並實踐他的信仰與理念。

在新竹青年會成立以前，陳旺成與他的朋友有意組織兩個研究團體，一個是以社會主義思想的研讀為主，另一個則是以白話詩文的寫作為主，雖然他們為此曾經舉辦過幾次聚會，但最後這二個研究團體都未能正式成立。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也就是孫逸仙逝世後的數週間，陳旺成在自家的書房舉辦紀念這位他心中的「中國的偉人」孫逸仙的追悼會。當日與會者有十名，大多數是他在新竹的舊友，包括鄭作衡、張傑、張式毅、張榜、張澤、曾瑞堯、蘇福、劉春木、與戴良等人。這些與會者的主要組成分子大部份都具有與公學校或地方政府等公職相關職業背景，且大多屬於陳旺成新竹的朋友。在這個追悼會上，所有與會者先向孫逸仙的遺像行鞠躬禮，隨後宣讀由陳旺成所寫的悼文；會後，與會者通過組織一個研究會，定於舊曆每月十六日開會，當場並由陳旺成作出第一次的「有血有淚的」演講。台中霧峰林澄堂並為此追悼會送來北海道蘋果一箱作為祭品⁹⁶。陳旺成此時不僅關心社會主義思想與當代中國政治文化運動，就在此追悼會的一星期後，與這群組成略近的朋友在曾瑞堯家中舉辦另一

⁹⁵ 《陳旺成日記》，1925/3/27。

⁹⁶ 《陳旺成日記》，1925/1/29，1925/3/7，1925/3/13，1925/3/20，1925/4/2-3。

場聚會，當時陳旺成受邀作了另一次演講，題目為「自治的常識」，反映他對台灣政治文化啟蒙議題一貫的興趣與關心。雖然他對竹聲會不甚滿意，他在同年四月底也接受該會邀請，在新竹公學校的公會堂中作一次題目為「為什麼要讀書？」的通俗演講，吸引五百至六百名聽眾，其中半數為公學校學生，該場演講會的另外二位講員則談論有關衛生與婚姻等文化啟蒙問題⁹⁷。在此之後，陳旺成與一些新竹地區的朋友，開始透過修訂竹聲會的既有章程，進行新竹青年會的籌組事宜。在一九二五年初期，許多新竹之外的其它地區，由當地知識人所組成的社團舉辦的演講活動，也像新竹地區一樣變得越來越普及。

擁有超過十名成員的新竹青年會，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成立於新竹公會堂，並由李良弼擔任會長；而二星期之後，由陳旺成負責經營並由此新竹青年會成員之中的八名成員合資的一家針織工廠也正式成立。新竹青年會的成員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底擴張至超過三十名，其成員的職業背景多來自小學教師、地方官廳的行政人員、商人與醫生等。新竹青年會經常在公家場所舉辦演講會，談論文化性議題，每次都能吸引新竹地區的民眾數百名。但是與反殖民的台灣文化協會相較，這個新竹青年會似乎與殖民政府較為接近；就在新竹青年會於公會堂成立當天，陳旺成的日記透露，他與李良弼在當日稍早前往街役場和藏田街長交換有關新竹青年會（竹聲會）以及台灣文化協會的意見，並獲得藏田街長「十分的理解」，顯示新竹青年會的成立是在地方當局的理解與默許之下進行的。然而地方當局雖曾嘗試說服新竹青年會接受官方的金錢資助，卻沒有具體而直接的證據顯示新竹青年會實際獲得該項資助⁹⁸。倒是陳旺成負責經營的針織工廠在建立之初曾獲得官方在技術上的支援，同時，陳旺成和李良弼也透過當時擔任地方政府勸業課長的台灣人劉明朝的協助，成功地獲得官方對該針織工廠的金錢資助⁹⁹。

事實上，陳旺成當時正面臨著是否加入反殖民的台灣文化協會，或是選擇在地方政府內工作的兩難處境。因為從一九二五年中開始，雙方都想將他拉攏到自己的陣營之中。一九二五年五月間，一位名叫吳廷輝（1891~）的木匠與

⁹⁷ 《陳旺成日記》，1925/4/8，1925/4/26，1925/5/9。

⁹⁸ 《陳旺成日記》，1925/5/22，1925/5/27，1925/5/30，1925/6/14，1925/7/4，1925/7/9。

⁹⁹ 《陳旺成日記》，1925/7/5，1925/7/12，1925/7/13。

學金木二位台灣文化協會的新竹成員，以提供支薪工作為誘因，設法極力說服陳旺成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並擔任文協的新竹支部的負責人；其間，二人向陳旺成暗示，他們是受到林獻堂的旨意前來交涉此事的。結果，陳旺成當場婉拒二人的提議，並建議他們應該先強化新竹青年會，而不是去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的新竹分會¹⁰⁰。大約在這個時候，日本的地方官員與特務也開始針對陳旺成與台灣文化協會之間的接觸進行監視¹⁰¹。約在數週後（6月7日），包括林獻堂、蔡惠如與蔡式毅（1884~1951）等台灣文化協會的領導人物，來到新竹進行該會在當地的首次演講會，當時共有五位講員公開演講，分別談論「文協的使命」、「迷信的打破」、「社會制裁與法律」、「革新人心與改造社會」、「教育平等」等議題，吸引前所未見的人潮，陳旺成記錄當日的盛況如下：午後二時睡起，急跑到驛樓，林獻堂氏一行迎接者共有四、五百人；一行以人力車、自動車（繞）新竹街一週，處處炮竹聲響，好像迎神一樣……；來成記，招大張一行往文協演講場（畚仔吳廷錫宅），聽眾約有兩千人，為新竹空前的盛況。

次日，陳旺成邀請林獻堂等文協一行人到自家中，與新竹青年會成員共同用餐並交換意見，隨後一同攝影留念；但新竹街的藏田街長稍後亦獲邀前來，加入這場宴會¹⁰²。以上的證據顯示，文協領導人受到新竹民眾如同「迎神」一般的崇拜與熱情的歡迎，而理念與文協相近的陳旺成自然也感受到新竹的民意趨向，並有意地與文協發展更為接近的關係；但他也邀請藏田街長稍後加入宴會，顯示他並無意得罪日本殖民政府當局。

殖民政府地方當局當然瞭解新竹青年會與台灣文化協會之間漸趨密切的接觸，並設法藉著對新竹青年會的拉攏，以分化兩會之間漸趨密切的關係；然而官方的舉動立即導致新竹青年會內部成員之間緊張關係的升高。大約在此一時期，殖民政府的地方官員數度造訪陳旺成負責經營的針織工廠，建議他接受地方政府的財力支援。陳旺成婉拒官方對新竹青年會的財力支援，但同意並爭取官方對該針織工廠的資助。然而數星期以後，新竹青年會內部的緊張關係開始升高，在它的成員之中支持日本殖民官方與支持台灣文化協會成員之間的直接

¹⁰⁰ 《陳旺成日記》，1925/5/3-4，1925/5/6-8，1925/5/12，1925/5/16，1925/5/19，1925/5/25。

¹⁰¹ 《陳旺成日記》，1925/5/1，1925/5/21，1925/6/1-2。

¹⁰² 《陳旺成日記》，1925/6/2，1925/6/7-8。

衝突也開始引爆。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新竹青年會會長李良弼（當時任職於官營公司）和戴良（曾擔任過教師且當時任職於地方政府），與陳旺成雙方，為了新竹青年會是否應該與半官方的地方保甲組織共同成立一個普渡改良會的提案，爆發一次嚴重爭執¹⁰³。陳旺成認為保甲組織並非如李良弼所堅持的是個「純粹的自治」單位，因此反對新竹青年會與之合作。次日，一份台中的官方報紙卻刊載新竹青年會已經同意在普渡改良的議題上與保甲組織合作的新聞，陳旺成對該報導的反應是極為憤怒。但是，經過由幾位該青年會成員所組成的調解會的運作之下，此一內部的衝突很快地達成和解¹⁰⁴。

雖然，殖民政府地方當局幾乎已經成功地將陳旺成收編到地方政府中擔任公職，但陳旺成最後仍然決定加入反殖民的台灣文化協會陣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陳旺成本身的社會關係網絡所產生的作用；其次則是因為台灣本土社會與殖民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在當時急速升高所致。一九二五年十月九日，台灣文化協會新竹支部正式成立於台灣民報社的新竹批發所，成立當日林獻堂與蔡培火等領導人物與會，新竹民眾則「沿途爆竹不絕」以示對林獻堂等人的熱烈歡迎。當日下午陳旺成與林獻堂等人合照，並同桌共用晚餐。飯後，陳旺成自認為「義不容辭」，而答應林獻堂等人的要求，首次為台灣文化協會公開站台演講。陳旺成公開為文協站台的舉動意謂著他向反殖民的文協陣營更進一步地傾斜，但他的此一舉動也立刻引起殖民政府地方當局的關注，並於三天後派日本人安山視學到針織工廠，力勸陳旺成接受新竹郡役所的工作的提議。當時陳旺成在新竹青年會的朋友多勸他接受這個公職，他起初仍猶豫不決，但在十天之後，他終於決定接受這個殖民政府的地方公職。¹⁰⁵然而，陳旺成作出此決定的二星期之後，他卻推翻此一擔任公職的決定，而決定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的陣營。

在什麼情境之下，陳旺成作出這樣戲劇性的轉變呢？當筆者審視一九二五年十月中、下旬的歷史情境，也就是陳旺成作出此戲劇性決定的情境，可以推測這個戲劇性轉折的主要原因：首先，就在陳旺成決定擔任殖民政府地方公職

¹⁰³ 「普渡」又稱為「中原普渡」，係佛道的宗教儀式，通常在農曆七月舉辦；「保甲」是清代通行的半官方地方制度，此一制度為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府採行，用以協助警察處理地方事務。

¹⁰⁴ 《陳旺成日記》，1925/7/7-8，1925/8/9，1925/8/11，1925/8/21-23。

¹⁰⁵ 《陳旺成日記》，1925/10/9-12，1925/10/19。

的一個星期以後（1925年10月26日），台灣中部的二林地區發生一件大規模的蔗農暴動事件，大約有四百至五百名蔗農攻擊警察，其後續效應導致本地社會與殖民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快速升高。兩者上升中的緊張關係也可間接地從當時新竹民眾對台灣文化協會與新竹青年會兩者的支持度的明顯差別中看出。在新竹地區，反殖民的台灣文化協會所舉辦的演講通常可以吸引數千名聽眾，而較為溫和的新竹青年會所舉辦的演講通常只能吸引到數百名聽眾而已，這個比較上的差異顯示出前者遠較後者更受當地民眾的支持，而陳旺成當然也明白這一點¹⁰⁶。其次，陳旺成置身於這樣的民眾意向的情境中，他同時也深深感受到來自台灣文化協會陣營朋友圈一波波的勸說壓力，此一朋友圈的社會網絡關係最後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反轉陳旺成先前擔任公職的決定，而投入台灣文化協會的陣營之中。就在陳旺成決定擔任公職之後的第十天（1925年10月29日），陳旺成在新竹的舊友（曾任教員），同時也曾經留日的台灣文化協會主要幹部蔡式穀，親自力勸陳旺成加入文協，擔任文協派駐新竹的講員，並允諾支付月薪六十日圓。自此陳旺成開始認真地考慮加入文協並婉拒在郡役所擔任公職；五日之後（11月4日），台灣文化協會的另一位重要幹部，同時也是陳旺成先前在總督府國語學校的同學蔡培火，邀請他參加一場由幾位文化協會的新竹成員（包括新竹的紳商楊良）所舉辦的會議。就在會議結束後，陳旺成終於決定加入台灣文化協會¹⁰⁷。然而，陳旺成此一決定立即招致親官方陣營的新竹青年會會長李良弼反彈，質疑他在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之後並未退出新竹青年會。此一內部爭端隨後經過會員投票而獲得解決，大多數會員決定讓陳旺成留在新竹青年會內。大約一個月之後（12月15日），陳旺成受到台灣政治文化運動陣營領導者林獻堂的邀請，前往霧峰林家的宅第作客兩日，意謂著陳旺成現在已經穩定地投入此一陣營之中¹⁰⁸。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陳旺成戲劇性的決定加入文協陣營，主要導因於他本身與文協重要幹部之間的社會關係網絡所產生的作用；其次則是因為台灣本土社會與殖民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從那個階段開始明顯升高所致。

¹⁰⁶ 《陳旺成日記》，1925/10/26，1925/11/15，1925/12/13。

¹⁰⁷ 《陳旺成日記》，1925/10/29，1925/11/4。

¹⁰⁸ 《陳旺成日記》，1925/11/6，1925/11/10，1925/12/2，1925/12/15。

（四）在臺灣島規模（Taiwan-size）的政社關係網絡中進行台灣國族主義的普及化（1926~1930）

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二期間，陳旺成因以具體行動參與全島性的台灣政治文化運動而開始經歷他自身政治化的過程，而在此一過程中，他建立了以台灣為規模且相互重疊的朋友圈，其組成分子來自台灣文化協會、新竹青年會、台灣民報社與台灣民眾黨等團體。陳旺成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正式任職於台灣民報社之前的一整年間，他為台灣文化協會所作的全島性演講，加上為新竹青年會所作的地區性演說，其總次數達到三十七次之多（1925.12~1926.12），這也顯示出他當時已全心投入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陣營之中。陳旺成所作的這些演講主題大部份是與近代西方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理念相關，它們的目的在於採取一種較為溫和的方式，以啟發那些居住在城鎮與鄉村的台灣民眾。陳旺成所擔綱的演講會通常以吸引的聽眾人數，從一百人到四千人不等，他們主要透過台灣文化協會地方分支機構以及新竹青年會動員而前來參加的¹⁰⁹。值得一提的是，透過台灣文化協會的全島性社會網絡的運作，陳旺成的朋友圈也大大地擴展到全島的規模，換句話說，陳旺成當時正積極參與一次由台灣知識人所主導，同時以台灣全島為規模的台灣人民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整合運動，而此一兼具多面向的台灣人民的整合運動，目的在於喚起台灣民眾將自身想像成一種稱為「台灣人」的共同體，這正是台灣國族主義的基本結構與具體內涵得以在一九二〇年代後期逐漸形成的關鍵。

雖然陳旺成在意識型態上已逐漸顯現出左傾的思想；但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當台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成左傾與非左傾兩個陣營的時候，陳旺成卻選擇與台灣文化協會內部的非左傾陣營站在同一陣線；事實上，文化協會此次的內部分裂效應也擴及到他全島性的朋友圈之中，並導致他朋友圈內部產生某種緊張關係的升高。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間，台灣文化協會可以視作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大後方，它以文化運動的形式，向台灣民眾進行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理念的啟蒙與宣傳。結果隨著社會主義思想的普及，越來越多農民與工人

¹⁰⁹ 《陳旺成日記》，1925.11-1926.11。陳旺成在台灣文化協會與新竹青年會等團體所舉辦的地方性與全島性的演講會中，分別在1925年做出28次演講，1926年做出27次演講，1927年做出14次演講。

的成員加入，台灣文化協會逐漸從原來的文化運動取徑轉變成為帶有國族主義性質的階級運動團體。到了一九二七年一月，台灣文化協會在台中舉辦一場會議，由連溫卿領導的文協左傾成員在會中取得主導權。此發展導致由蔣渭水與蔡培火等人所領導的非左派成員決定退出會場，也意謂著台灣文化協會內部因意識型態及路線的不同問題而造成分裂。當時，陳旺成選擇與溫和的國族主義者蔣渭水站在同一陣線。在文化協會此次的分裂後的幾個月間，這些文協內部的非左派成員正式成立台灣民眾黨，陳旺成則名列五位創黨委員之一¹¹⁰。在新竹地區，陳旺成與這些屬於新文協的左傾激進成員保持一定的距離；稍後，這些激進的新文協地方成員因過激的舉動而遭到當地警察部門的壓制¹¹¹。

在一九二七年夏季，時值台灣民眾黨的籌組過程中，陳旺成針對幾個關鍵且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所作的提案，在該組織幾次籌備會議中獲得大多數成員投票通過，因此他得以成為台灣民眾黨的五位創黨委員之一，並且很快就浮出檯面成為該黨的中心人物之一。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季，為了籌組台灣民眾黨，相關人員至少舉辦過三次的會議，但陳旺成並未參加，顯示他在那個期間尚未成為該組織的主導人物之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台灣民黨（台灣民眾黨的前身）在台中召開第一次正式會議，與會人士包括陳旺成在內共有六十八名。由於殖民當局已經事先對該黨成員作出警告，在官方的壓力之下，在會中該黨領導人蔣渭水與蔡培火因而對於台灣民黨的黨綱是否應該依照官方意思用「自由平等」取代「台灣人的解放」的壓力而備感困擾；然而，陳旺成經過詳細說明「解放」一詞的明確意涵以後，在會中堅持該黨黨綱不應該作任何修正，這個提案隨後獲得多數成員的投票認可¹¹²。然而殖民當局認為該黨在黨綱中納入「台灣人的解放」一詞是完全無法接受的，因為它意謂著台灣人走向「台灣自決」的可能性；四天以後，台灣民黨被迫解散¹¹³。此一事件之後的第三日，蔣渭水、蔡培火、謝春木（台灣民報記者，1902～1969）、黃周（台灣民報記者，1899～）與彭華英（1893～1968）等人在台灣民報社召開一次會議，討論如何

¹¹⁰ 同註 2, pp. 490-491.

¹¹¹ 《陳旺成日記》，1927/2/16-18。

¹¹² 《台灣民報》，161 號（1927 年 6 月 12 日）。

¹¹³ 《陳旺成日記》，1927/5/29，1927/6/1，1927/6/3-4。

在台灣民黨遭到解散後重新組織新的政治團體。同年六月十七日，這些成員在台中召開另一次會議，由於殖民當局事先再度作出警告：只有台灣民眾黨黨綱中沒有出現台灣民族主義主張的情況下，蔣渭水才得以加入新成立的黨。為此，與會成員在會中開始討論蔣渭水是否可以成為黨員的議題；陳旺成隨即提議讓蔣渭水加入成為黨員，並且不在黨綱中加入民族主義，此提案再度獲得半數以上成員的通過。因此台灣民眾黨在形式上成為非民族主義的政黨，而陳旺成也獲選為五位創黨的委員之一¹¹⁴。同年七月十日，台灣民眾黨在台中正式成立，與會成員有六十三名。

當陳旺成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加入唯一由台灣人創辦並以介紹近代西方新思維為主的改革派報紙《台灣民報》的時候，他已經開始邁向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非左派陣營的核心圈之中。雖然陳旺成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五年期間大都住在新竹，但透過《台灣民報》社全島性社會關係網絡的運作，他得以與台灣民眾黨成員維持密切的接觸。《台灣民報》是承續自改革派刊物《台灣青年》與《台灣》而來的，它在一九二四年由一群台灣知識人創立於東京，包括台灣自治運動的理論基礎創構者林呈祿以及蔡培火等人；後來，《台灣民報》的分支設在蔣渭水台北的住處，並於一九二七年八月正式將總部由東京移入台北，當時該刊物的發行情已經超過十萬份¹¹⁵。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由於當時《台灣民報》記者謝春木積極鼓勵，陳旺成正式加入這個位於台北的週報，擔任該報派駐新竹的記者。直到一九二七年底，謝春木與陳旺成二人都在《台灣民報》擔任記者，同時也都是台灣民眾黨的重要幹部¹¹⁶。當時（1927）的《台灣民報》社有超過四十名成員，全部都是台灣人；主要成員包括林呈祿、蔡惠如、蔡培火、蔡式毅、蔣渭水、楊肇嘉、陳逢源、謝春木與黃周等，他們同時也是台灣民眾黨的重要幹部或領導人。直到一九二七年底，台灣民眾黨在全台灣已經設立十五個支部，並擁有四百五十六位成員，陳旺成則兼為該黨的中央委員會及中常會的成員。至於，陳旺成與台灣文化協會（新文協）的關係，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天正式脫離新文協的時候，當

¹¹⁴ 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 362-366。《陳旺成日記》，1927/6/17，1927/7/10。

¹¹⁵ 洪桂己，《台灣報業史的研究》（台北市：台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年），頁 75。

¹¹⁶ 《陳旺成日記》，1926/9/29，1926/10/6，1926/11/10。

時的新文協已經擴展到四千三百九十三名成員¹¹⁷。比起一九二七年以前的舊文協，這些新文協的組成分子出身背景大都較為年輕，教育程度也較低。至於在新竹地區，自從陳旺成脫離文化協會後，他所屬的台灣民眾黨與當地的新文協成員間的關係明顯惡化。一九二七年十月，陳旺成的舊友林冬桂（當時為新文協新竹支會的負責人）指控他每月固定從殖民政府的地方當局領取金錢酬勞。到目前為止，筆者並無直接的證據可以證實這項指控，若只從陳旺成的日記觀之，他與其他新竹青年會的朋友所合資的針織工廠，確實曾經獲得地方政府勸業部門在技術上的協助與金錢上的資助，但這類的官方協助與資助可能是當時殖民政府鼓勵民間產業發展的公開政策，而非來自官方私相授受的買收行為¹¹⁸。不論這項指控是否為事實，這反映出當時（1927 年底）台灣政治文化運動陣營內部因思想的衝突而逐漸激化成其它形式的衝突。此一衝突關係不僅存在於台灣民眾黨與新文協之間，稍後也在台灣民眾黨內部逐漸蔓延開來。

陳旺成最後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從台灣政治文化運動陣營中退出，不僅是因為台灣民眾黨與《台灣新民報》（其前身為《台灣民報》）之間逐漸激化的思想衝突，同時也與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日本帝國的軍國主義興起導致台灣左傾勢力受到有效鎮壓有關。此外原本相對溫和穩健的台灣民眾黨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併入台灣工友聯盟之後，一方面使它的成員擴張到十萬名之多，另一方面卻因納入眾多左傾成員而使該黨逐漸轉變成一個左傾的團體。兼併左傾勢力的舉動進一步導致該黨內部分裂成兩個派系；合併後初期，蔣渭水與陳旺成、黃周與謝春木等重要幹部尋求與工友聯盟的左傾勢力妥協，因此勉強得以掌控台灣民眾黨的主導權，但其政治代價則是導致黨內在意識型態上的緊張關係擴大。到了一九三〇年八月，台灣民眾黨內右派勢力包括林獻堂、蔡培火、蔡式毅、陳逢源與楊肇嘉等十六名具有資產階級背景的主要成員，決定脫離該黨另外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他們稍後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正式被逐出台灣民眾黨¹¹⁹。

¹¹⁷ 李政亮，〈日據時期新竹政治社會精英初探〉，收入《竹塹文獻雜誌》第 10 期（新竹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9 年），頁 86-87；《陳旺成日記》，1927/7/22。

¹¹⁸ 《陳旺成日記》，1927/9/22，1927/9/27，1927/9/29，1927/10/7，1927/10/18，1927/10/21，1927/11/1，1927/11/29，1928/4/6-7，1929/12/17。

¹¹⁹ 《陳旺成日記》，1928/7/15，1928/7/26；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 422-425。林獻堂並未被逐出，而是在稍後離開台灣民眾黨。

此後的發展是，蔣渭水與謝春木提議進一步透過修改黨綱，將台灣民眾黨定位成「以工農階級為中心的民族運動」團體。這個提案在一九三一年二月被送到該黨的一個委員會中接受審查。然而陳旺成本身雖然相當同情社會主義思想，也與蔣渭水和謝春木等人在工作上及私交上關係甚佳，但他仍結合幾位該黨在新竹地區的成員，表達對該黨黨綱修正案的反對意見。陳旺成反對的主要理由在於：他堅持台灣民眾黨的創黨精神在於該黨是為「全民」而存在，而非只為無產階級而存在¹²⁰。雖然陳旺成等人表示反對，但這個黨綱修正案仍獲得通過，並於十天後經該黨黨員大會投票通過，該修正案因此確定。

然而黨綱修正案的通過卻迫使殖民政府當局在十天之後下令解散台灣民眾黨，這也意謂著始自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的台灣政治文化運動，至此遭受到進一步的打擊。而陳旺成全島性的政治與社會關係網絡至此則縮小到以《台灣民報》及新竹地區為限的朋友圈之中。到了一九三二年八月，這個緊縮化的情勢因陳旺成進一步辭去《台灣新民報》的職務而持續發。陳旺成的辭職事件導因於他與楊肇嘉之間的衝突，楊肇嘉是《台灣新民報》的董事，同時也是具有資產階級背景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要角。他抱怨陳旺成與《台灣新民報》刻意不刊登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演講活動新聞；但陳旺成辯稱《台灣新民報》是為「全民」而非為「資產階級」服務的。這個因意識型態的差異而衍生的衝突最後卻導致陳旺成辭去該報的所有職務。在辭職之後，雖然有超過四百位來自全島各地參加為聲援陳旺成而在新竹舉辦的惜別會，但陳旺成作為一個意識型態上左傾但政治行動上近於中間派，新竹出身的台灣知識人，他此後只能在其僅存的新竹地區社會關係網絡之中發揮其影響力¹²¹。

簡言之，從一九三一年初台灣民眾黨遭到解散起，陳旺成的社會關係網絡從原來的全島性規模，開始快速地萎縮到地區性的規模，特別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辭去《台灣新民報》職務後，更僅侷限於新竹一地。陳旺成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快速地緊縮化發展，也映照出當時處於島內外大環境下的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整體性沒落的趨勢。

¹²⁰ 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 430-440。

¹²¹ 《台灣新民報》，1932 年 8 月 27-28 日，1932 年 9 月 3-4 日，1932 年 9 月 7 日。

二、陳旺成的閱讀資料：陳氏的台灣國族意識的建構 ——一個「抽象的／意識型態的」取徑

本文的第二部，筆者將檢視陳旺成的閱讀資料是否影響、並透過何種方式影響他的思想世界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對於他在一九二〇年代期間，自身「國族自我」意識的建構與重構上所產生的影響。

（一）以漢文化主義為部份基礎的「本島人」意識的發展（1910年代）

首先，筆者想問的問題是：在一九二〇年以前，陳旺成閱讀資料的概況為何？陳旺成完成國語學校的教育後，開始在新竹公學校長達八年的教書生涯（1911~1918）；自從一九一二年起，他才開始寫日記，並以極其規律地態度持續寫作習慣，直到一九七三年。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八年間，他保有規律閱讀日文報紙、雜誌與其它日文出版品的習慣，同時他也閱讀部份以文言文書寫的中國文學作品，包括漢詩與古典小說。具體而言，以一九一二年日記紀錄為例，陳旺成平時在學校中規律地閱讀《台灣日日新報》，這份官方的日文報紙創立於一八九八年，同時也是一九一〇年代初期在台灣發行唯一的報紙，為顧及台灣讀者需要，這份日文報紙內有一漢文版。此外，陳旺成有時也閱讀在日本刊行並引入台灣的日文雜誌，像是為因應日清戰爭而來的社經變遷所發行的日本綜合性雜誌先驅《太陽》（東京博文館 1895 年發行）、於一八九九年東京刊行的另一份綜合性雜誌《中央公論》、東京發行的大眾雜誌《實業の日本》（東京大日本實業學會 1897 年發行）等等。並且作為一個剛剛投入教職生涯的年輕教師，陳旺成特別關心與教育相關的出版品，像是以介紹西方教育思想的日文書籍《新教育》（1906 年出版）、由山下半治所寫的明治時期日本教育名著《小學教師論》（帝國禁酒會 1894 年出版）、關於數學教學法的《聚樂式教授法》、《通俗統計學》（出處不明）、關於世界地理及歷史知識但出處不甚明確的《萬國地理》、《外國地理》與《萬國歷史》等書籍¹²²。陳旺成對於法律方面的書籍也略有涉獵，

¹²² 《萬國地理》可能是由前橋孝義所著，由東京的富山房出版。《外國地理》則可能是由東京金港堂或敬業社所編的版本，大約在 1890 年代出版。

例如《六法全書》（出處不明）與法律的入門書籍《法學の栞》（新報社出版）等。由於中國辛亥革命於一九一一年十月間爆發，引起國際社會極大關注，陳旺成也在數月之後特別訂購一本由斷水樓主人所寫的《支那革命實見記》（東京：金尾文淵堂，1911）一書，顯示他對中國時事的關注，並透過此書而對孫逸仙的中國革命有較清楚的瞭解；此外，他也閱讀石村貞一編的《元明清史畧》（東京：東生書館，1877）。以上的證據意謂著陳旺成當時（1912）對世界的認識、對中國的時事與歷史的瞭解，主要似乎是通過日本人所寫並於日本發行的日文出版品取得。然而，陳旺成雖可被視為接受完整日本教育成長的第一代台灣知識人，但他在公學校與國語學校教育之前仍讀過以傳統漢文教育為主的私塾長達八年，且他積極參與詩社，喜好與朋友吟誦寫作漢詩，偶而也盡情於閱讀《紅樓夢》、《夢中五美緣》與《八美圖》這類的古典小說¹²³。

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八年間，陳旺成每年平均閱讀的中日文書籍（就日記中所見）比起一九一二年明顯減少，但仍對日文與文言體中文出版品感到興趣，特別是他對古典文言體小說與詩作的興趣明顯增加。在此期間，他持續規律閱讀當時台灣唯一的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以及其它的日文雜誌像是《台灣教育》與《地球》（出處不明）等，加上一些關於西方歷史及日本歷史的書籍¹²⁴。很明顯地，陳旺成在這段期間閱讀較多的古典中文文學作品，他頗醉心於閱讀清代的古典言情小說如魏秀仁的《花月痕》與曹雪芹的《紅樓夢》、蒲松齡所著關於鬼怪故事的《聊齋》、文人作家袁枚的詩評《隨園詩話》、作家袁樹的詩集《紅豆村人詩稿》，明代羅貫中著名歷史小說《三國演義》及元代王實甫所寫的著名戲曲《西廂記》等等¹²⁵。如本文第一部所言，陳旺成在此期間積極參加「亂彈會」詩社的聚會，而且對於漢詩極為狂熱，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間，他在日記中抄錄的古典漢詩，達到二百三十首之多。

簡言之，審視陳旺成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八年間的閱讀資料，我們只能得到一個陳旺成本身的閱讀興趣和重點，以及閱讀環境與閱讀資訊的來源方

¹²³ 《陳旺成日記》，1912年。

¹²⁴ 《陳旺成日記》，1913/1/3，1913/4/27，1915/1/2，1915/2/28，1916/6/9，1916/6/20，1916/6/23，1916/9/15，1916/12/18，1917/4/23，1917/6/25，1917/12/12。

¹²⁵ 《陳旺成日記》，1913-1917。

面的概略性資訊；但由於他當時對所讀過的作品鮮少在日記上作出評論或抒發讀後感想，以致筆者無法透過對這些讀物的檢視而清晰地描繪出他在此期間的思想世界樣態。然而，以上的討論讓我們瞭解到，陳旺成主要是透過閱讀日文刊物以瞭解每日有關台灣、日本、中國與其它世界的新聞資訊。換言之，作為接受日本教育的第一代台灣人，日文是陳旺成用來吸收外在世界各種資訊的主要媒介，並藉以型塑他的世界觀。然而在一九一〇年代期間，特別是一九一三年以後，除了日文作品以外，他對古典中國文學（特別是小說與漢詩）興趣有強化的傾向，同時對詩社活動相當積極，這顯示出他以漢文化主義為部份基礎的本島人認同意識逐漸增強；這導因於學校內部介於本島人與內地人之間的工作歧視，且因語言問題爭議而產生的衝突足以激化兩者之間族群認同的疆界。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陳旺成到了一九一五年二、三月間開始改用文言體中文書寫日記的原因。

（二）一個新的思想自我（ideological self）與思想世界（ideological world）的建構（1920~1925）

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一九二五年間，陳旺成在台中蔡蓮舫家工作達五年之久。在台中期間，他逐漸暴露在由國外傳入台灣的新思想的環境中，導致他思想世界的重構，同時也影響他認同意識的重塑。筆者的問題是：陳旺成在此一階段中所閱讀的出版品，對於他的思想世界重構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1、陳氏的閱讀資料概觀（1920年~1925年3月）

由於《陳旺成日記》一九二〇年份日記已經遺失，筆者在此只能以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間出現在他的日記中的閱讀資料作為討論對象。自一九二二年六月起，陳旺成開始訂閱官方的《台灣日日新報》，並於此後幾年間持續閱讀此一發行於全台灣的日文報紙（內有一漢文版）。有時候他也會閱讀地方性日文報紙，像是《經世新報》、《台中新報》與《台灣新報》等，至於他讀的日文書籍包括日本及中國的外交歷史，西洋歷史、文學與地理等方面的書。此外，他自一九二四年八月起開始閱讀日文的社會主義作品，像是賀川豐彥（1888~1960）

的日文小說《死線を越えて》，以及列寧的社會主義日文譯作。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一九二一年一月起，陳旺成便固定地閱讀東京台灣留學生所辦的改革派雜誌《台灣青年》，該雜誌在一九二〇年七月開始發行，以日文為主，但也提供漢譯的版面；後來，陳旺成繼續閱讀由《台灣青年》演變而來的《台灣》與《台灣民報》，而這兩份刊物兼用日文及漢文兩種語文出版¹²⁶。

然而，在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五年期間，陳旺成的其它讀物主要是以漢文（文言體中文）及白話文（近代式中文）書寫而成。陳旺成對於古典中國文學仍然保持相當的興趣，這類的作品包括漢代史學巨擘司馬遷的《史記》、明代余邵魚的通俗歷史小說《東周列國志》、徐枕亞的著名粵劇《玉梨魂》、王彥泓的豔體詩《疑雨集》、清代小說《再生緣》、明代洪應明關於生命哲學的名作《菜根譚》、宋人所編從唐代到宋代的詩集《千家詩》、清代朱梓與冷昌言所編的《宋元明詩》等等。此外，陳旺成的中文閱讀讀物也包括晚清與民國初期在中國與台灣所出版的作品，這類書籍包括民國時期王文濡的《清史評註》、收錄梁啟超自晚清以來作品的《飲冰室全集》、連橫在日治中期台灣所出版的台灣歷史作品《台灣通史》（1920）以及兩本文學作品《大陸遊記》及《大陸詩草》（1921）¹²⁷。然而，大約從一九二四年中起，陳旺成對中國新文化運動開始感到興趣，並開始採用白話文以取代文言文寫作，同時開始閱讀收錄中國新文化運動要角胡適（1891~1962）的改革性文章的《胡適文存》，與另一要角陳獨秀（1879~1942）的文集《獨秀文存》，以及王統照的白話小說《一葉》（上海 1927）等作品；此外，他為了學習北京話，也閱讀像是《官話會話》以及《中國口語會話指南》等北京話入門的相關書籍¹²⁸。

2、思想世界的重新定位：以三份台灣人創辦的雜誌為中心的討論

在一九二〇年四月至一九二五年三月間，陳旺成所經歷思想世界重構的軌跡，可以從他的閱讀資料與相關事件的連結，所作的主題式討論中加以呈現出來；特別是聚焦在幾份由台灣人主導的改革性雜誌與報紙，像是具有一脈相承關係的《台灣青年》、《台灣》與《台灣民報》等刊物。

¹²⁶ 《陳旺成日記》，1921/1-1925/3。

¹²⁷ 《陳旺成日記》，1921/1-1925/3。

¹²⁸ 《陳旺成日記》，1924/5/15，1924/5/24，1924/7/1，1924/7/30，1924/10/17，1925/2/8-9，1925/2/20。

在陳旺成日記中的證據顯示，早在一九二一年年初，台灣意識與反差別待遇等問題已經是他當時關注的主要議題。如前提及，陳旺成記載他在一九二一年間就已經讀過由台灣人主導的改革性雜誌《台灣青年》達六次之多，意謂著他當時便是這個剛發行半年（1920年7月創刊）月刊的固定讀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六日，當陳旺成讀過《台灣青年》以後，他對該刊物內〈六三問題之沿革〉一篇文章作出詳細的摘要，並瞭解到當時林獻堂與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正設法透過運動以廢除作為殖民差別統治法律基礎的六三法；此一紀錄也透露他已開始關心剛剛興起的改革派留日台灣青年的活動。也同樣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間，陳旺成熟衷於閱讀連橫新近出版的台灣史作品《台灣通史》，該書是當時唯一的台灣通史作品，提倡台灣民眾作為漢族的台灣意識感¹²⁹。由於陳旺成心中隱約存有此一重疊著漢族意識的台灣意識感，我們不難理解他會對《台灣青年》中的兩篇由海外台灣留學生所寫的文章感到「令人拍案叫快」；首先，陳旺成贊同台灣留學生黃熾昌對日本知名的台灣事務作家橋本白水對台灣的「歧視性」觀點的駁斥¹³⁰；其次，兼具有台灣意識與平權觀念的信念，陳旺成贊同蔡培火在《台灣青年》上發表主張台灣應仿效日本內地實行義務教育政策的另一篇文章¹³¹。

再者，此時期陳旺成第二個閱讀上的重點是有關婚姻制度改革的問題，這同時也反映出他在反歧視議題上的興趣。從一九二〇年代初期起，改革派的《台灣青年》雜誌就已經提出改革傳統婚姻制度的議題¹³²。而在一九二一年十一至十二月間，陳旺成則熱衷於與朋友公開爭辯有關同姓婚姻的問題，並且喜愛閱讀有關此一主題的新聞與文章，這可證之於他認為《台灣青年》雜誌上陳崑樹的一篇題為〈根本的婚姻革新論（續前）〉的文章「非常值得閱讀」，並在他的日記中寫下該文的詳細重點摘要。陳旺成甚至報名參加生平首次的徵文比賽，徵文題目是「同姓可否結婚？」這是由一份日文報社《台灣新聞》所舉辦的活動，陳旺成在比賽中獲得第四名。我們瞭解到他傾向認為同姓婚姻在道德上是不可行的，但他在日

¹²⁹ 《台灣青年》第1卷第5號（東京：台灣青年雜誌社，1920年），頁6-9；《陳旺成日記》，1921/1/6，1921/1/9，1921/1/14，1921/1/30。

¹³⁰ 《陳旺成日記》，1921/7/17。黃熾昌，〈橋本白水先生に答ふ〉，收入《台灣青年》第2卷第5號，1921年，頁59-63。

¹³¹ 蔡培火，〈二年振りの歸台〉，《台灣青年》第3卷第1號，頁83-85。

¹³² 《台灣青年》第1卷第5號；《台灣青年》第1卷第2號，第3卷第1號，第3卷第5號，第3卷第6號。

記中並未提及此一意見的理由。然而，陳旺成參加此一徵文比賽的意義在於：直到一九二一年底，陳旺成置身於由海外改革派的台灣留學生所推動的台灣政治文化啟蒙運動所開展出的思想環境之中，時間雖僅一年多，但他強烈感受到需要用公開的方式表達他對一些爭議性或受大家關注的議題觀點，這也意謂著這個處於變動初期的思想環境對他越來越相關，也越來越具有意義感¹³³。

陳旺成在此期間第三個閱讀上的重點則是在反殖民主義的主題上，這也與他上升中的台灣意識相關。如前所述，在一九二三的一整年間，改革派台灣知識人在台灣推動舉辦更多的演講會，也印製更多的出版品，它的效應具體反映在台灣社會中則是一股上升中的反殖民情感。檢視陳旺成所閱讀一九二三年份的《台灣》雜誌所見，他的反殖民情感具有二個根源：首先，這個反殖民情感源自於他相信以台灣文化的特殊性為基礎的台灣自治理念。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陳旺成記載他「詳細地」閱讀陳逢源在《台灣》雜誌上所寫的一篇文章〈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並認為該文「相當具有可讀性」。陳逢源認為：由於日本同化主義政策對亞洲的復興構成矛盾，因此只有立基於台灣文化特殊性的台灣自治才能被台灣人民所接受；事實上，在同一期的《台灣》雜誌的「卷頭語」中，該雜誌主筆極力主張，在以去除種族歧視與階級意識為基礎的全球性改造運動中，「台灣意識的自覺」有其重要性，此一提倡台灣意識的論點應對陳旺成產生說服力¹³⁴。其次，陳旺成反殖民情感的另一個來源在於他對日本殖民政府及其所掌控的官方媒體越來越不信任。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陳旺成記載他發覺另一期的《台灣》雜誌「滿冊慷慨可誦」，而在讀過留日學生黃朝琴（1897~1976）在該期雜誌所寫，駁斥並指正官方的《台灣日日新報》刻意誤導民眾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報導之後，他在日記上寫道：「（經）一一指正，始知予等多受御用新聞之蒙蔽，深愧識見淺狹，而服留學生諸君之努力。」黃朝琴在這篇題為〈言論の責任を重ぜよ——《台灣日日新報》の嘘に驚く〉的文章中，詳細指出《台灣日日新報》在一九二三年初期所作的報導中有數處錯誤，

¹³³ 《陳旺成日記》，1921/11/8、1921/11/13、1921/11/15、1921/11/25、1921/12/1-2、1921/12/5-6。《台灣青年》第3卷第5號。

¹³⁴ 《陳旺成日記》，1923/1/13。陳逢源，〈亞細亞の復興運動と日本の植民政策〉，《台灣》（東京：台灣雜誌社1923年1月），頁1、18-32。

並進而從其它報紙或資料中引用正確事實以匡正這些錯誤報導，有效地挑戰官方媒體的權威論述，打破殖民政府極力建構並維護的統治神話¹³⁵。

再者，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三月，陳旺成的閱讀上的重點包括二個新浮現的領域：首先是他對社會主義書籍的興趣，像是前述他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參加無力者大會之後熱衷閱讀賀川豐彥的《太陽を射る》一書，稍後並在他的思想世界中浮現對社會主義關懷的思想基調。其次，他在與中國事務相關的閱讀上，其重心明顯從中國古典文學轉移到當代中國進行中的「新文化運動」；而這項新的發展也可證之於他開始嘗試用白話文寫日記、學習北京話，以及開始閱讀中文的社會主義作品。當陳旺成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從台中回到新竹以後，這兩個新浮現的閱讀重點領域明顯得到進一步強化。

3、形成中的思想傾向與核心理念（1925年3月～1925年12月）

如前所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九個月期間，陳旺成深陷於是否該加入反抗殖民政府陣營或是加入支持殖民政府陣營之間的糾葛關係。筆者的問題是：他在這八個月期間的閱讀讀物，對於他最後投入反抗殖民政府陣營的決定是否產生影響？在這九個月間，陳旺成閱讀讀物的概況如下：他除了規律地閱讀改革派台灣人主導的《台灣民報》、官方的日文報紙《台灣日日新報》，以及其它的日文報紙與雜誌包括《大阪朝日新聞》、《經世新報》、《台南新報》、《改造》等刊物以外，陳旺成密集地閱讀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相關的雜誌與書籍。這類的閱讀刊物包括：鄭振鐸等人所編，以推展新文化運動為目標，並以白話文書寫的《小說月報》雜誌；陳獨秀的《獨秀文存》；胡適的《胡適文存》、《中國哲學史大綱》與收集胡適白話詩作的《嘗試集》；反儒家先鋒吳虞的文章集成《吳虞文錄》；魯迅（1881～1936）的童話譯作《愛羅先珂童話集》（A Fairy Tale of V. Eroshenko）。除了這些在中國出版的白話文作品之外，陳旺成也閱讀清水安山於一九二四年在日本出版，討論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日文作品《支那新人と黎明運動：新儒教、新文學、新運動》一書。再者，陳旺成在此一期間持續閱讀社會主義作品，這些作品幾乎都是在日本出版的日文書籍，像是生田長江與本間久雄（1886

¹³⁵ 《陳旺成日記》，1923/5/1。黃朝琴，〈言論の責任を重ぜよ——《台灣日日新報》の嘘に驚く〉，《台灣》1923年4月，頁43-50。

～1981）合著關於社會議題的暢銷書《最新社會問題十二講》（1919 初版）；福田德三（1874～1930）的《社會政策と階級鬥爭》（1922 東京初版）；河田嗣郎的《農村問題と對策》（1924 初版），以及一本關於馬克斯理論但出處不明的書。陳旺成的其它讀物則環繞在進化論的主題之上，像是松村松平的《進化と思想》；石川三四郎的《非進化論と人生》（1925 東京初版）；謙田榮吉《進取論》（1915 東京初版）；馬爾薩斯（Malthus）的作品中被認為對達爾文的進化論造成影響的《人口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書。此外，還有幾本關於文化與政治方面的書籍，像是土田杏村的《文化哲學入門》（1923 東京初版）；由政治人物末松偕一郎所寫的《地方自治制要義》（1923 東京初版）等書¹³⁶。

這關鍵的九個月期間，以上所列的這些閱讀讀物是否對陳旺成最後決定投入反殖民陣營造成影響呢？前面提及，在一九二四年中期，陳旺成開始將閱讀的興趣延伸到與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相關的書籍，以及來自日本的日文社會主義書籍兩個新領域。雖然他的台灣國族意識以及台灣自治觀點持續位於自身思想世界的中心，在一九二五這一年間，與社會主義相關的中日文書籍已經成為他最主要的閱讀領域，至於他在與中國新文化運動有關的書籍的閱讀上也有所增加¹³⁷。

首先，關於社會主義，陳旺成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間曾閱讀何海鳴（1887～1944）用文言文寫成於民國初年的散文集《求幸福齋隨筆》，並從該書中得到「很多的社會學的知識」，這是陳旺成的中文讀物中最早出現「社會學」的內容，但此處的「社會學」是否與社會主義有關仍不明確。但可以確知的是，陳旺成對中文的社會主義知識的瞭解明顯與他對陳獨秀的《獨秀文存》的閱讀有關；從他的日記所見，從一九二五年三月底到四月間，他密集地閱讀《獨秀文存》一書，並詳細記下該書的重點與讀後心得。陳旺成以虛心的語調並試著用帶點生疏的白話文記道：「看了《獨秀文存》一百餘頁，得了許多社會思想、文學等要革新的必要，並現代有勢力的各種主義者的趣旨。」可知他當時正處於初步認識包括社會主義思想的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階段。而另一個日記紀錄顯示在他讀過《獨秀文存》中關於上海紡紗廠招募湖南女工的討論之後，「得了勞資問題上多少的智識」。

¹³⁶ 《陳旺成日記》，1925 年 3-12 月。

¹³⁷ 《陳旺成日記》，1925/1/9，1925/1/16，1925/2/21，1925/3/27。

陳獨秀除了在中文的社會主義知識上對陳旺成產生啟蒙作用之外，他在政治上的自治論也深受陳旺成信服，認為他是「以中國現代救世主自負」，且「他的論旨很中中國的時弊，十分激烈」，但他關於「東洋的道德是全部要破壞的，西洋的文明可以救濟中國的積弱」的論斷卻被陳旺成視為「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¹³⁸。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間，陳旺成花了兩個星期在閱讀並摘要兩本有關地方自治與綜合性的社會與政治思想的書籍，並從中獲益甚多；這兩本書是生田長江的《地方自治要義》與本間久雄的《最新社會問題十二講》；前者談論地方自治的基本原則，而後者則論及法國革命、工業革命、社會主義、馬克斯主義、民主研究與勞工聯盟等等社會思想主題。至於，從後來陳旺成固定閱讀的左傾綜合性雜誌《改造》（1919 東京創刊）中的一篇文章，陳旺成學到列寧的思想以及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的歷史¹³⁹。再者，陳旺成也嘗試將他從社會主義思想書籍所得到的知識，直接應用在他稍後（1925 年間）在新竹及台灣的其它地區所作的演講之中，可見這類的讀物對他的思想世界的重塑與思想上的實踐具有明顯的影響。一九二五年八月間，陳旺成花兩星期的時間閱讀一本由福田德三所著的《社會政策と階級鬥爭》（改造社，1924），並在兩個月後（1925.10）的一場由新竹青年會主辦的演講會中，以「階級鬥爭」為題目進行公開演講，這是他首次在演講會中公開談及鮮明的社會主義議題，但當時的聽眾最多並未超過百餘人¹⁴⁰。兩個月後（1925.12.10）他繼續閱讀由河田嗣郎所寫的另一本社會主義的作品《農村問題と對策》（改造社，1924），並於同月稍後在苗栗公館及屏東潮州作了兩場由文化協會主辦的公開演講，講題分別是「農村文化」與「農村文化之建設」，前者吸引約四千聽眾，後者則吸引千餘民眾前來聽講¹⁴¹。簡言之，陳旺成在此一期間（1925 年間）的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主要是閱讀日本學者在日本出版的日文社會主義著作而來的，其次則是閱讀陳獨秀等人的中文作品而來。再者，陳旺成在此一期間關於社會主義著作的閱讀應該有助於他對台灣民間社會中弱勢的工農階級的瞭解及同情，這種在意識型態上往「無力者」陣營傾斜的發展，對

¹³⁸ 《陳旺成日記》，1925/3/20，1925/3/28，1925/3/30，1925/3/31，1925/4/1，1925/4/4，1925/4/7，1925/4/16，1925/4/28。

¹³⁹ 《陳旺成日記》，1925/4/23，1925/6/13，1925/6/16-17，1925/6/21-23。

¹⁴⁰ 《陳旺成日記》，1925/8-11，1925/10/24。

¹⁴¹ 《陳旺成日記》，1925/12/2，1925/12/10，1925/12/13，1925/12/30。

於當時身陷反殖民政府與支持殖民政府之間糾葛關係之中的陳旺成，有助於他在稍後在政治上選擇投入以台灣民眾為訴求的台灣文化協會的反殖民政府陣營之中；我們如果將他當時在意識型態上往「無力者」陣營傾斜的這個發展，放置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二林蔗農暴動事件後，導致台灣社會與殖民政府之間緊張關係快速升高的背景脈絡來觀察，則顯得特別有意義。

其次，在這關鍵的九個月期間，陳旺成強化其以白話文寫作的興趣，並增加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相關書籍的閱讀，特別是胡適的著作。陳旺成大約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初期開始固定使用白話文寫日記，並嘗試組織白話文詩社，但並未成功。他透過有系統地閱讀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而取得對中國哲學的基本理解；至於胡適的《胡適文存》與《嘗試集》這兩本代表作品則增加他對新文化運動的興趣與瞭解，他當時開始規律地使用白話文寫日記，並嘗試組織白話文詩社，應該多少受到胡適的這些作品的影響¹⁴²。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新文化運動之外，此一時期陳旺成對中國事務的興趣也包括與國民黨相關的議題，這是因為一九二五年三月間孫逸仙逝世的緣故。陳旺成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在自家書房舉行「中山先生追悼會」，並用白話文寫一篇題為「孫中山先生弔詞」的祭文，陳旺成在祭文中將孫逸仙視為「中國過去三百年來的大偉人」，因為他推翻滿清對四億漢族的統治與壓迫；陳旺成也推崇孫逸仙為中國的「民族自決、政體革新與社會改良」等方面作出貢獻，並視他為自由、平等與人權的化身¹⁴³。上述體現在孫逸仙身上的這些近代式西方政治理念，如民族自決、自由平等等價值，也正是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政治文化運動的行動家與支持者共同信仰的核心價值。

陳旺成置身在相對自由的大正民主時期台灣政治文化環境之中，在他的思想世界中逐漸形成二個核心的新理念，亦即他對演化論的信念以及對反迷信的堅持。在一九二五年的一整年間，陳旺成在台灣各地作出二十八場公開演講，其中有三場演講直接談論演化的主題，有兩場演講則以反對迷信等舊習俗與舊道德為主題。在一九二五年的下半年間，陳旺成閱讀至少三本與演化論相關的書籍，其中包括松村松平的《進化と思想》與社會主義者石川三四郎的《非進

¹⁴² 《陳旺成日記》，1925/4/22，1925/5/1，1925/5/11，1925/5/13，1925/5/21，1925/6/4-5，1925/9/25。

¹⁴³ 《陳旺成日記》，1925/4/3。

化論と人生》(東京初版, 1925)等書。陳旺成至少有二次的演講主題直接受到這些書籍的啟發, 例如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剛讀過松村松平的《進化と思想》一書, 當日他就在苗栗作一場題為「自然征服與人生」的公開演講, 吸引二千餘名聽眾到場¹⁴⁴。再者, 陳旺成對演化論的信念, 或多或少也引導他走向反迷信的社會實踐上。陳旺成於一九二五年三月間回到新竹以後, 一直懷有以行動啟蒙民眾並改變新竹的文化環境的用心, 直到同年八月間, 他開始積極宣導反對普渡的宗教習俗, 並嘗試成立一個以改良宗教與社會陋習的組織, 期待可以「救援沉溺在迷信深淵中之新竹社會狀況」¹⁴⁵。

簡言之, 在這關鍵的九個月間, 陳旺成思想世界的圖像: 以台灣國族主義為基礎的台灣自治理念仍位於他的思想世界的核心; 而他對社會主義的興趣以及對中國啟蒙運動的關切的這二個思想新傾向, 則明顯受到強化; 至於他對演化論的信念以及對反迷信的堅持也浮現在他的思想世界中。換言之, 從一九二〇年起, 陳旺成的思想世界開始經歷一次「近代式的」震盪、轉化與重構, 當這個思想過程持續到一九二五年底左右時, 他已經在思想上與政治上同時作好投入反殖民陣營的準備。

(三) 陳氏的台灣國族主義的構想, 及其與他的新思想世界的內在關係 (1926~1930)

陳旺成從一九二五年年底開始投入反殖民陣營的台灣文化協會中, 並在該會所舉辦的全島性巡迴演講中擔任講員; 一年後, 從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起, 他也開始在《台灣民報》社工作, 擔任該社派駐新竹的地方記者。在這段為反殖民陣營工作的期間(1926~1930), 陳旺成的閱讀資料的概況為何? 陳旺成在這段期間除了固定閱讀改革派台灣知識人主辦的《台灣民報》外, 他也固定閱讀官方的日文報紙《台灣日日新報》, 並偶爾閱讀辜顯榮等人在一九二八年創刊於台北, 且較偏向台灣總督府的《昭和新報》(只刊行一年之久); 此外, 他也經

¹⁴⁴ 《陳旺成日記》, 1925/6/20, 1925/9/26, 1925/8/9, 1925/11/13, 1925/12/12, 1925/12/19, 1925/12/23, 1925/12/25-26。

¹⁴⁵ 《陳旺成日記》, 1925/5/9, 1925/5/13, 1925/8/4, 1925/8/9, 1925/8/11, 1925/8/21。

常閱讀左傾的《改造》（特別是從 1928 年以後），以及《海外》等雜誌；《海外》是一本提倡並介紹國際政治與思潮的日文雜誌，它於一九二七年初在東京創刊。

然而，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間，陳旺成主要的閱讀的重心仍在社會主義的作品上，這些作品大部份是在日本出版的日文作品，包括河上肇的《唯物史觀解說》與《第二貧乏物語》二書，以及九本關於社會主義的理論性著作，它們包括馬克斯（Karl Marx）《資本論》的日文譯作（東京，1922）、高島素之的《マルクス十二講》（東京，1927）、高田保馬的《社會學原理》（東京，1925）、北澤新次郎的《新社會の建設》、丸楠禮仁的《左翼小見病》，以及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創刊於東京的《社會科學》雜誌等刊物；至於，其他與社會主義相關的著作有《ロシア共産黨小史》（出處不明）與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的《獄中日記》等書。此外，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期間，陳旺成另一個閱讀重心是在日本出版有關自由主義的日文作品，它們包括出處不明的《英國議院制度史》與《議會的作用》二書，森日繁治的《立憲主義と議會政治》、田川大吉郎《普選の話》（東京，1925）、以及矢內原忠雄關於殖民政策與朝鮮政經問題的著作，包括《植民政策の新基調》（京都，1927）、《朝鮮の統治方針》與《朝鮮年米増殖》等三書¹⁴⁶。至於，陳旺成閱讀的其他書籍則是關於近代西方思想、歷史與文學等領域的作品，也是以日本出版的日文書籍為主，它們包括三本關於西方歷史的書，以及八本關於近代思想與人物的作品，例如由木村毅（1894~1979）等人所寫的《世界宗教十六講》（東京，1925）、桑木巖翼的《近代思潮十講》、出處不明的《新精神運動》與《ガンジー と真理の抱持》、沢田謙的《ムツソリニ傳》，堺利彦譯的《自由社會の男女關係》，以及其他四冊日文文學作品，包括廚川白村的《苦悶の象徴》、《象牙の塔を出て》與《近代の恋愛觀》（東京，1922）等書；而自從陳旺成從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開始在《台灣民報》擔任記者之後，他也對於《新聞編輯學》這類在日本出版的新聞專業書籍感到興趣¹⁴⁷。

值得注意的是，大約自一九二七年開始，陳旺成關於中國事務的閱讀，其重心逐漸從新文化運動轉移至中國當代政治的議題，特別是與國民黨相關的出版

¹⁴⁶ 《陳旺成日記》，1926-1929。

¹⁴⁷ 《陳旺成日記》，1926-1929。

品，它們包括六本以孫逸仙為主題的書籍，例如在日本出版的日文書著作《孫文主義》，上海的三民公司所編的中文書籍《孫中山逸事集》（1926），與出處不明的《中山先生讀本》、《孫公遺書》與《孫文主義哲學》等書；另有三本關於中國國民黨的中文書籍，包括甘乃光的《國民黨幾個根本問題》與出處不明的《蔣介石講演集》與《中國國民黨講演集》等書¹⁴⁸。關於新文化運動中文著作的閱讀，僅有周作人的白話散文作品《雨天的書》，田漢、宗白華和郭沫若等三位作家所寫的書信集《三葉集》（上海，1927），以及郁達夫的白話著作《郁達夫日記》等書。此外，陳旺成也在日記中記載他讀過幾本中文古典文學作品，例如清代劉鶚的《老殘遊記》、施耐庵的《水滸傳》與《唐詩》等¹⁴⁹。簡言之，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期間，陳旺成的閱讀重心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思想、自由主義政治，近代西方的歷史與文化等領域之上，但在中文的閱讀方面則集中在與國民黨相關的人物與思想之上，這意謂著他的中文閱讀逐漸離開新文化運動這一個主題上。

陳旺成關於中國事務的閱讀重心逐漸從新文化運動轉移至中國當代與國民黨相關的出版品，在一九二七年左右開始的閱讀重心轉移究竟該如何理解？如前所述，陳旺成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開始在《台灣民報》擔任記者之後，他偶爾替該刊物撰寫政治與社會議題方面的評論文章，從一九二七年八月起，他每週固定負責撰寫題為「冷語」的專欄評論文章，主要是針對島內外的時事作出評論，特別是以台灣島內、日本帝國與中國事務等幾個領域為中心。在一九二七年的中國，蔣介石正帶領北伐軍往北方一路挺進，這個發展明顯吸引陳旺成的關注，他在日記中記載蔣介石的軍隊在南京、山東與華北等地贏得一連串勝利的消息，並在《台灣民報》的「冷語」中針對這類的事件做出評論¹⁵⁰。除此之外，陳旺成在台灣文化協會的巡迴演講會中，兩度以「中華革命的民眾運動之狀況」和「中國的民眾運動」為主題進行公開演講，並於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間撰寫至少三篇關於中國政治情勢的文章¹⁵¹。在一篇用白話文寫於一九二七年三月標題為「孫中山先生與北伐軍」的文章中，他深信，因為孫逸仙卓越

¹⁴⁸ 《陳旺成日記》，1927，1929。

¹⁴⁹ 《陳旺成日記》，1926，1929。

¹⁵⁰ 《陳旺成日記》，1927/3/28，1928/4/19，1928/5/1，1928/5/4，1928/12/29。

¹⁵¹ 《陳旺成日記》，1926/11/1，1927/2/15，1927/2/24-25，1927/3/21，1927/3/26，1927/4/8，1927/5/22，1927/5/25，1928/5/13，1928/12/14。

的「三民主義」思想的緣故，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北伐軍將「一定能夠統一全中國」；他進一步解釋道，「三民主義」包含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等核心思想，這套思想體系將可在政治上與經濟上讓中國成為一個如世界強權一般的民主國家¹⁵²。這篇文章顯示，在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間，陳旺成對孫逸仙的堅定支持，也反映出他對中國國民黨的樂觀期待，以及對中國的正面意象；換言之，陳旺成此一正面樂觀的中國意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此一期間他所閱讀關於中國事務的出版品的影響。

再者，陳旺成繼續閱讀自由主義的著作，特別是議會制度、立憲主義，以及像田川大吉郎與矢內原忠雄（1893~1961）等自由主義派學者關於殖民政策的日文著作。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他在日記中記載閱讀《英國議院制度史》之後，感到「大有趣味，（並）摘要於備忘錄」之中；三個月後，他閱讀森日繁治的《立憲主義と議會政治》一書以後，「深感」該書作者論述的雅意。事實上，陳旺成對議會的實際運作也有興趣，他同另外四位友人前往新竹街協議會旁聽，當日旁聽席中除了二位特務之外，別無其他的旁聽者；他進而仔細評論幾位官選的街協議員的表現，並得到一個結論：「足見人民的政治思想之未發達也」。此外，他對台灣精英所主導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仍然保持一定的關心，日本特務也曾試圖瞭解他對該請願運動的最新意向¹⁵³。為了喚醒台灣民眾的政治意識，在一九二六年間，他在台灣文化協會的全島性巡迴演講中，至少十次的演講主題是環繞在喚醒並提升台灣民眾的近代政治與法律方面的觀念；而在同一年期間，他總共針對各種不同的主題作出二十七場次的演講，在全島各地吸引聽眾的數目，從三百名到四千名不等。

然而，一九二七年七月間，在殖民政府的壓力之下，台灣民眾黨的創立意謂著非左傾的台灣政社人士已經將原本以國族主義為訴求的「台灣人民全體的解放」修改成「民主政治的創建」¹⁵⁴。而陳旺成本人最後也接受此一「政治上」的妥協。但是，陳旺成與台灣民眾黨在「政治上」的妥協是否也意謂著陳旺成當時也在「意識型態上」修正了他台灣國族主義的主張呢？

¹⁵² 《台灣民報》148號（1927年3月13日）。

¹⁵³ 《陳旺成日記》，1926/1/13，1926/1/28，1926/1/30，1926/5/3，1926/5/5，1928/5/24。

¹⁵⁴ 《台灣民報》第161號，第166號（1927年）。

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期間，陳旺成寫了二篇關於殖民政策與台灣民族運動議題的文章，但其中只有一篇文章獲得刊載。在這篇題為〈後藤新平氏的「治台三策」〉並刊載於一九二七年《台灣民報》白話文書寫的文章中，陳旺成透過對先前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1857~1929）依據以治理台灣的三個策略的檢討與批判，提出他對「台灣民族」的具體定義與構想。此一官方治台的三個策略是針對後藤新平對台灣民眾的三個弱點的觀察而制定的：首先，因為台灣人「貪財」，所以要用小利來誘引他們；因為台灣人「怕死」，所以要用壓迫的手段來控制他們；因為台灣人「好面子」，所以要用頭銜來拉攏他們。透過對這三個治台策略的批評，陳旺成認為台灣人民過去習慣對政治壓迫心生恐懼，同時對那些在公家機關內工作的人們感到羨慕，這些現象源自於他們缺少「政治的自覺」。但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人民學到了如何去抵抗政治壓迫，也開始看不起那些在公家機關內工作的人。因此，陳旺成認為「因為台灣民眾缺少政治的自覺」而導致他們受到後藤新平的愚弄；「如果他們可以結合在一起並尋求弱小民族的解放，改善他們自身的缺點以及明瞭他們作為弱小民族的悲哀」，那麼，台灣民眾就可以避免受到再次的愚弄¹⁵⁵。在這一篇文章寫於一九二七年的文章中，陳旺成透過將台灣人民構想成一個「尋求解放的弱小民族」，首次在文字概念上將台灣人民想像成為一個國族（nation）。陳旺成在《台灣民報》的政治短評「冷語」中，有幾篇短評也將印度人與朝鮮人視為在帝國主義統治下承受苦難的「弱小民族」¹⁵⁶。

然而，陳旺成此一將台灣人與印度人、朝鮮人皆視為有權尋求「弱小民族的解放」的觀念是從那裡來的呢？前面談到，一九二四年七月的「無力者大會」影響陳旺成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發端，並強化他立基於台灣國族主義的台灣自治的信念；再者，陳旺成的這個「弱小民族的解放」的觀念首先可能也與他先前（1924）參加「無力者大會」的經驗有關連，其次這個觀念應該與他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期間因廣泛閱讀各種社會主義出版品而產生一種對於「無力者」或「弱勢者」的心理上的關懷與意識型態上的傾斜有所關連。在陳旺成另一篇

¹⁵⁵ 《陳旺成日記》，1926/5/13，1926/12/25，1927/6/9，1928/3/7，1928/5/24。《台灣民報》145號（1927年2月20日）。

¹⁵⁶ 《台灣民報》第193號、第195號、225號（1928年）。

題為〈什麼叫作「水平運動」？〉的文章中（刊載於1927年4月），陳旺成透過對「水平運動」的討論與解釋，以繼續此一關於「無力者」或「弱勢者」的關懷；他寫道：「水平運動」是由一個「弱勢的」社會團體所發起的運動，這個社會團體相信「自由與平等」，並嘗試透過去除它們在日本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的努力，以尋求該團體自身的解放¹⁵⁷。這篇文章刊出八個月以後，陳旺成與蔣渭水等人在新竹公會堂進行公開演講，他以「弱者之力」為主題，雖然他在演講過程中遭到警察中止，但也顯示出他對「弱勢者」議題的持續關懷；而陳旺成對於「弱勢者」的關懷以及對社會主義思想的閱讀，正是他的台灣國族意識得以在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間的歷史脈絡中獲得建構與再建構的關鍵¹⁵⁸。

就政治上與意識型態上而言，在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間，到底陳旺成所信仰的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呢？陳旺成的一篇題為〈台灣社會事業〉的文章，刊載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底《台灣民報》上，這篇文章刊出的時候，他剛從左傾的新文協中退出數週之久。在這篇文章中，陳旺成預測，日本殖民政府將很難在台灣實行「溫和的社會主義」；他進一步解釋道：由於資本主義有嚴重的貧富之間階級衝突的缺陷，因此逐漸發展出兩種新的取徑以改善資本主義的這種缺陷，它們就是蘇聯的社會革命路線以及英國的社會改革路線。在日本，蘇聯的社會革命路線是非法的，而英國的社會改革路線是合法的；然而，日本政府卻公開支持資本家，而讓勞工處於不利的地位；至於，在殖民地台灣，台灣勞工的處境甚至比日本勞工還差¹⁵⁹。上述的這篇文章透露出在一九二七年初台灣的歷史情境下陳旺成對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解與態度：他反對資本主義並支持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路線，而這一點可以從他在一九二七年初以具體的政治行動退出由激進的左傾分子掌控的新文協獲得間接的印證；同時，陳旺成作為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也可從他反對新竹地區的激進社會主義者攻擊警察的暴力事件（發生在一九二七年底）的同時，卻在事件之後對這些遭到警察逮捕的激進社會主義者提供必要的協助這一點上得到印證。此外，在與朋友合資的小型針織工場中，有時也面臨女工罷工或勞資糾紛的困擾，但陳旺成處理這類的情事顯得較具耐心，有時他會花費

¹⁵⁷ 《台灣民報》第151號，1927年4月。

¹⁵⁸ 《陳旺成日記》，1927/12/30。此一演講會因未知的理由在其結束之前受到警察解散。

¹⁵⁹ 《台灣民報》，第142號，1927年1月30日。

相當長的時間對工人進行溝通與說明¹⁶⁰。再者，從陳旺成在此一時期（1926～1930）的閱讀刊物加以檢視，雖然他對社會主義書籍的閱讀顯得非常熱衷，但至少閱讀過二本批判社會主義的書籍，以及不少自由主義的作品，這顯示他曾經嘗試在不同的性質、主題與觀點的出版品之間取得一個閱讀上的平衡。

在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間，在陳旺成的台灣國族意識的建構與再建構的過程之中，漢文化主義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一般而論，陳旺成對於台灣的漢文化之中的傳統質素抱持批判的態度。在一九二五年間，他的中文刊物的閱讀重心已經從古典中國文學轉移到近代的白話文學，甚至開始固定使用白話文撰寫日記與文章。他持續透過公開演講等方式反對作醮與喪葬等「宗教迷信」的習俗；在一九二六年中期，他至少在新竹進行過二場這類反迷信的演講，而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新竹青年會內部的一次激烈的辯論以後，他甚至成為在該會內部籌組以改革傳統漢人社會陋習為主旨的組織的主要推動者¹⁶¹。再者，陳旺成對於台灣的漢文化的批評也指向傳統的婚姻制度；在一九二五年八月間，他花了一整個星期熱衷於閱讀廚川白村以自由戀愛為主旨的《近代の戀愛觀》一書，並且對於堺利彥關於近代社會兩性關係的翻譯作品《自由社會の男女關係》一書感到興趣¹⁶²。陳旺成對於傳統婚姻制度的反傳統思考，不僅反映在他與媒妁之言而結婚的妻子之間長期的不融洽關係上，同時也反映在他與一位客家女子之間長期的外遇關係之上（始於1929年）。雖然當時的台灣社會在法律上容許男子娶妾，但在戰前陳旺成並未正式公開這段戀情，也未與他的妻子離婚。這段戀情剛開始的那段期間，陳旺成在日記中可能為了確保這段戀情的私密性，他有時使用由蔡培火等改革派台灣知識人所推行的台語羅馬字，以撰寫部份的日記內容¹⁶³。

最後，在陳旺成的台灣國族意識的構想中，中國國族意識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應該如何被理解？陳旺成在一九一二年剛開始寫日記時採用日文，直

¹⁶⁰ 《陳旺成日記》，1926/2/17，1927/5/4-5，1927/11/27-30。

¹⁶¹ 《陳旺成日記》，1926/5/14，1926/6/15，1926/7/3，1927/3/5，1927/3/9，1928/4/25。《台灣民報》第149號（1927年3月20）。

¹⁶² 《陳旺成日記》，1925/8/20-28，1927/3/13。

¹⁶³ 《陳旺成日記》，1923/7/21，1929/5/7-12，1929/6/6-8。陳旺成在1923年左右開始學習台語羅馬字。

到一九一五年三月間才固定以文言體的中文寫作日記，而在一九二五年二月間又改以白話體中文寫作日記，並持續使用白話體中文直到戰後的一九七三年。如前面的討論，陳旺成到了一九一五年二、三月間開始改用文言文寫作日記，主要原因在於他以漢文化主義為部份基礎的本島人意識逐漸增強，這一方面是因公學校內部本島人與內地人之間的工作歧視與語言問題相互激化而產生的，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自一九一三年起他對古典的漢文學與詩社的閱讀和參與的興趣有明顯強化的傾向。到了一九二〇年代前半期，此一以漢文化主義為部份基礎的本島人意識經歷一次再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陳旺成的本島人意識逐漸轉化為台灣國族意識，而在這個台灣國族意識的構造之中，一個主要受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以及局部受到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潮的雙重影響之下而產生的中國國族主義的認同面向，開始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逐漸浮現出來；並且在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間，他的這個新傾向因中國國民黨在北伐成功之後崛起而受到強化。

然而，在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間的歷史脈絡中，陳旺成的台灣國族意識構造之中的中國國族主義認同面向的具體內涵應該如何被理解呢？一九二八年九月，陳旺成刊載於《台灣民報》的「冷語」專欄的一篇政治短評中，他針對當時的台灣時事作出評論，他說：「台灣人殷切期待」創立另一份由台灣人主導的報紙，但同時卻擔心「台灣人的解放運動（已經）進入一段苦難的階時期」，因為當時殖民當局已開始鎮壓台灣政治社會運動，並拘禁許多台灣運動精英。在這一篇文章中，他繼續針對當時的中國時事作出評論：他個人為蔣介石得以成功將滿洲納入中國的版圖感到欣喜，但他同時對中國共產黨在湖南殺害數百名地方官員的作法表達反對的意見，因為「這不是建設新中國的正確做法」¹⁶⁴。以上的評論文字顯示，置身於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間的台灣歷史的脈絡中，陳旺成逐漸期待一個由中國國民黨而非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中國的崛起，這個政治的期待，加上他於一九三〇年代上半期間以具體行動到中國尋求新的工作生涯所見，他的中國國族主義認同面向在一九二〇年代後半期間應該已經浮現在他的台灣國族認同的構造之內。

¹⁶⁴ 《台灣民報》第 226 號（1928 年 9 月 16 日）。

